

# REMEMBRANCE

#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Irregular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 《记忆》276期

### 【编读往来】

方惜辰与张克民的通信

### 【专稿】

王克明 徐孔十年祭

### 【人物】

刘家驹 军中一霸

——我知道的罗瑞卿大将

孙言诚 一代宗师 学界奇人

——我所了解的张政烺

### 【评论】

方延曦 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

### 【序跋】

李 锐 这段历史是很重要

——《历史转折中的华国锋（1973-1981）》序

### 【读书】

李 辅 史无后例唯所求

——读周孜仁先生《云南文革史稿》

越 人 对叶昌明回忆的看法

### 【编读往来】

1. 赵晖谈“揪军内一小撮”
2. 何蜀谈方延曦专辑
3. 张晓良纠错
4. 王芳正误

### 【本刊声明】

**【编读往来】**

张克民先生 大鉴：

在《记忆》的会员里，出生在三十年代的还有六人，排在您前面的还有三位，第一位是元史专家，原北大历史系的教授周良宵和顾菊英伉俪（周先生是32年出生）。本来想给他们夫妇出一期专辑的，纪念他们编撰的三百万字的文革资料巨著《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三部曲（《十年文革前期（65.11—69.4）系年录》全三卷，《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全三卷）和《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但是三年来，我多次写信致意，这两位老师都没有回信——有的作者和读者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在《记忆》的读者中，80后和90后加起来不到30人。历史在断裂。

希望您有空给年轻人写几句话。

顺颂大安！方上 4-22

方先生，你好！

从你的回信看到一个残酷的事实，抢救文化革命这个无法抹去的历史事实，已经刻不容缓！虽然我在ANU的中文图书馆和史丹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里看到许多有关文革的第一手资料，但是民间的有名有姓、有血有肉、全方位立体的记录，无疑是对这些史料的补充，你们的工作部分填补了这个空缺。现在国内出版的所谓官方的正史，一般与史实出入较大，相信随着史实的揭露和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会得到改变。

你讲的《记忆》读者年龄分布，我并不感到意外，文革已经过去40多年了，现在我跟我的学生谈起，他们都有天方夜谭的感觉。遗憾的是，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因此而融入世界潮流，所以记录这些更有它的现实意义。千万不能把这次中华民族的浩劫遗忘了，否则必然还会产生形式变异的第二次文化革命。

其实《记忆》杂志的读者远不止你统计的那些数字，把它扩大数倍也不算为过。每个人后面还会延伸许多读者，我就是经由北大教授徐明曜延伸的，通过我又把它传递到我复旦老同学里不少人。应该看到这是经历文革的几代人的一种割不断理还乱的情结。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受到冲击，所以他们难以忘怀。我在《记

忆》里看到徐明曜自己叙述的具有代表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经历，从而知道他为什么有今天的认知。其实大多数经历的人都是如此，顶多程度不同。

《记忆》仅仅局限于记录文革有关的事情，可能会面临稿件来源枯竭，原因有二：其一，当事人存活在世上随着时间推移会越来越少，你的那个读者统计本身说明这个问题；其二，就文革本身的内容，一般当事人可能不会发掘出更多的有史料价值的材料。所以应该与时俱进才可能发扬《记忆》这个杂志的历史作用，不能否认当年取《记忆》这个名字时，有历史的使命感和先见之明。凡是与官方史不一致的、又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息息相关不能忘记的事件都应该是本杂志录入的内容，是历史赋予它新的内涵和使命。

从时间往前看的事件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当事人存活在世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往后就截然不同了，它也可以吸引一大批50后、60后的人参与进来，许多事他们都是见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也许对他们会更感兴趣。像“三农改革”“反自由化”“清污”“工业转型”“三千万工人下岗”等等改开后的大事件都可以民间史的形式纪录在案……一直到今天发生的新冠疫情（某些人对待“方方日记”的思想和态度，就是文革的借尸还魂），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值得记录的历史。

另外，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杂志是不是仅有网络版，也许目前这种生态环境下纸质版比较困难。所以这里也有一个长久保存而不被时间所遗忘的问题，否则就失去它的历史意义的作用。能进入图书馆就是一条好的思路，相对讲有人管理。国内的图书馆必须要找到相关的人，愿意做这件事，据我知道每个大图书馆都有一个目前对外不开放的馆藏库。这就是我上面讲的要找到人的原因，把读者面扩大了，找人这件事就相对比较容易了。国外的图书馆也是一样（我上面例举了两处，那是我自己去过的地方，其实还有许许多多），所不同的是它们一般都愿意收藏，仅仅需要找到路径即可。我们这辈人都已经退出了舞台，所以需要年轻人接班做这件事。另外也请注意，假如仅仅只有电子版，据我所知，它不像纸质书容易保存，要看储存电子文件的载体，一般过几年需要重新拷贝一次，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最后祝这个杂志在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面前能坚持下去，后继有人！📌

原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

张克民 2020-4-24

【专稿】

## 徐孔十年祭

王克明

我是从进入农民报开始，认识右派、了解右派、敬重右派的。1979年秋，地处东单西总布胡同的《农民报》开始筹建，人员一部分是老知青，一部分是老右派。我们这些老知青关于办报的知识，最初都来自老右派。

入冬时节，《农民报》已有十六七个人了。一天，四合院里来了一位瘦小老头儿，说是老头儿，其实才过五十。作为报社的总编，编辑部的业务、人事等都归他管。小老头儿话不多，和善地笑着说，他叫徐孔，和知青一样，也从农村上来，在反右时曾是“极右分子”。他的自我介绍，给我印象很深。我从小以为地富反坏右是敌人，到农村才知道地富是好人，到《农民报》才知道右派是好人，照此逻辑，极右分子就应该是极好的人。跟徐孔交往三十年，印证了这一点。

### 一

徐孔是辽宁海城人，原名李允德，生于1927年，1945年进入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两年后参加学院的文学戏剧创作组，加入了共产党。1948年他进入军队，在华北三兵团新华分社当记者，1950年开始任新华社驻华北军区记者，朝鲜战争期间任志愿军二十兵团记者。

1956年，驻朝鲜志愿军搞肃反运动，徐孔的直接领导给同级干部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徐孔看不惯，提出反对意见，于是“反革命分子”就改成了“反革命集团”。徐孔被指为“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强迫交代集团成员名单和活动内容，在朝鲜战场被武装看管、隔离审查了半年多。结果，那位领导非但没把徐孔整成“反革命分子”，反而在徐孔的不屈要求下，被迫当众向他道歉。而徐孔的厄运也就从此埋下了伏笔。

1957年徐孔回国，授了大尉军衔，在北京军区文化部当干事，开始写作有关朝鲜战争的长篇小说。反右运动期间，徐孔被借调到总政创作室，安排在北戴河搞文学创作，没参加大鸣大放。北京军区文化部由于没完成反右任务，领导有压力。那个被迫向徐孔道歉的领导窃喜——老天助我，给了我报仇雪恨的机会。

某日，军区领导在一起吃小灶，那领导不动声色地说，军区文化部有一个人，一贯对领导不满，攻击肃反运动。不但是“丁陈反党集团”主将陈企霞的学生，而且跟这伙人关系密切。这个人现在借调到了总政，逍遥于反右的大批判之外。正在为右派人数不达标而愁云紧锁的军区领导，登时喜上眉梢，立马把徐孔调回来，强迫他交代和陈企霞的关系，“愤怒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徐孔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贴了满坑满谷。1958年，反右“补课”，徐孔成了“极端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夺军衔，送天津黄骅县大苏庄劳教农场——毛时代搞过五十多次政治运动，借运动公报私仇的事不知凡几。与拳打彭德怀的将军比起来，军区的那位领导是小巫。

## 二

被送到劳教农场不久，就进入了大跃进后的大饥荒。后来徐孔在《直言无悔》里回忆道：“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副食又差，劳教人员中浮肿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由浮肿转干瘦，骨瘦如柴。凡是浮肿、干瘦的人都特别贪吃，解不下大便也要吃。在伙房打饭的时候，时常见到，有的人身子一栽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死掉了。在饥荒严重时期，农场一共饿死多少人不知道，因为八个分队在四个地方住，哪个队死了多少人从来不公布。只听基建队木工组的人说，有一阵子他们钉棺材供不上死人用。农场有个规定，劳教人员死了，给一口薄木板的棺材，这种棺材算上两头共有六块木板，拢起来用钉子一钉就成了，一天至少可以钉出十几口。木工组钉棺材供不上用，说明死人是不少的。”

几年后，徐孔成了“摘帽右派”，解除了劳动教养，但仍没有工作，只能留在劳改农场，定为五级农工，每月42元工资。在农场的十余年里，他经历了劳动的艰苦、饥饿的困苦、政治压力的精神痛苦，也因知识分子身份，当过当地的小学校长、图书馆长、豆腐坊师傅等。漫长的岁月中，徐孔一直在写小说，尽管进展缓慢，但从未停止，这是他能保持精神不垮的一个支柱。1964年，他悄悄写完了长篇小说的上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部认为，这是写朝鲜战争的作品中，一部较好的长篇，三审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出版。但了解到作者的右派身份后，说摘帽右派也是右派，没能出版。

1970年底，新规定地富反坏右不能吃商品粮，一律遣送农村，摘帽右派按



右派处理。于是，徐孔被停发工资，遣送回了辽宁海城县农村老家，在生产队里凭两只手挣工分吃饭。到了社会最底层，条件不会再恶化了，乡民对他也没有任何歧视，他心情反倒踏实了。每天早上出门拾粪，白天跟乡民一起下地劳动，晚上精神专注地继续写作，有时一晚上能写两三千字。文革后期他进京上访期间，仍抽时间写作，恢复工作后才中断。直到离休后他又拿起笔来，继续修改写作。199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徐孔所著100万字长篇小说《朝鲜战事》。

### 三

回老家当农民的几年，徐孔对中国农村现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有了深切了解。农民告诉他，土地收归集体后，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感到自己只是打工的，因此集体劳动不出力不上心，集体庄稼也没人爱护，没人热爱集体。但是个体生产积极性却很高，而且村中有不成文的规矩，谁都不损坏任何人的自留地庄稼。农民热爱私有排斥公有的不同态度，有天壤之别。这样真实的农村认知，决定了徐孔后来对包产到户和废弃人民公社集体化制度的支持态度。我曾投身农业学大寨，也深知农民贫困现状，跟他很说得来，常一起议论学大寨对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无用性，更一起议论包产到户在农村的可行性。

1980年1月中旬，向我交代任务，说报社派我去安徽省，随中宣部戴舟同志了解包产到户情况。到合肥我们分头儿，在芜湖碰过一次面，我共在安徽跑了24天。在金寨县大别山里，我看到贫苦农民住的房子腊月雪天四墙漏风，双目失明的老太太没有衣服，只能钻在脏污的破棉花套子里蔽体。在最早搞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公社，地方干部和贫苦农民围着我介绍包产到户后的收获。一位农民凑近我耳边，恳求地说：“记者同志，您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让包产到户，我们才有饭吃啊！”回到合肥，我参加了那年的安徽省农业会议，听各级干部对包产到户争论纷纷，听万里作第一次公开肯定包产到户的报告。

我插队时间长，天然倾向包产到户，回京后给徐孔等领导汇报，认为我们是农民报，最应该报道的就是农民的渴望，应该正面宣传介绍包产到户。徐孔赞成我的意见，其他一些老右派也赞成。但那时安徽邻省的高音喇叭正天天大喊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在北京，尤其是报刊上，这还是敏感话题。编辑部里也有说我“思想有问题”的话。虽然没能开展宣传报道，但是徐孔对包产到户的赞同态度，

和他不赞同说我思想有问题，保护我，使我心里感动。由于报纸还不能鼓吹包产到户，我从安徽带回的原始资料当时没用。春节过后，江北辰建议我把资料转给研究者。我就请示徐孔，说研究农村问题的陈一谔正在组织队伍，准备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我带回来的资料，能不能给他？徐孔说，咱们现在确实没办法，人家拿这些资料，应该比咱们有用，给人家吧。那时农民报已搬在王府井大街办公，陈一谔到那里取走了资料。

#### 四

1991年5月，徐孔的老领导杜导正请他担任《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经理，一起筹备创刊工作。徐孔因此成为《炎黄春秋》创办人之一。1948年徐孔在华北三兵团新华分社当记者时，分社社长是杜导正。刚走出华北联大校门的徐孔，说话做事直来直去，但年轻的老革命杜导正，从不计较年轻知识分子的不尊重。直到晚年他们共同办《炎黄春秋》时，徐孔还是这种性格，有一说一，直来直去，杜导正还是一直尊重徐孔意见。徐孔的夫人徐宝珍说，直言就是直接说真话，所以《炎黄春秋》这样求真求实的刊物很对徐孔的胃口，他晚年把全部心思都投在了这个杂志上。

听杂志社的朋友们讲，多年里，《炎黄春秋》的事务，是由杜导正、方实、宋文茂和徐孔等几位老人共同主持的。杜老是一把手，徐孔主要负责经营后勤方面，后来也负责稿件终审的编辑业务。遇有和杜老意见不一致时，方实总能平和地提出不同看法，徐孔总是直言，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不同意，大家一起沟通好了再做决定。几位老人形成的分工平衡，保持了杂志社的多年稳定。宋文茂和方实病后，徐孔在杂志社的平衡稳定方面权重更大，作用更重要。《炎黄春秋》长年来实行社委会负责制。杜老为此制定了“意见不一致下次再议”“少数服从多数”等议事三规则，成为社委会民主决策的依据。如徐孔和杨继绳反对杂志社给私人公司出资时，便依据议事规则，主张投票决定。结果大家都反对，否定了出资方案。

徐孔作为杂志社领导能直言不讳，大家也就什么都能说，所有事务都有很强的公开性。对于带有私心的东西，他总是个“黑脸儿”，不管人情，毫不客气。曾经有外省期刊办成家族企业类型，徐孔不赞同这种办法，坚持认为《炎黄春秋》



是社会公器，拒绝了让自己的女儿来杂志社工作的建议，也直言反对别人的女儿进来。他在世时给杂志社树立了一种正气之风，那时没有人要升职要权力要待遇。公开性成为常态，对杂志社的走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徐孔去世后，杂志社继续按议事规则运作，如杨继绳还会激烈地反对杜老的意见，拍着桌子反对他给人提升职位等。不过我个人旁观，觉得议事规则有民主集中制的性质，预留着否定民主的空间，所以最后能以小组取代社委会，使议事规则失效。到那时，大家对方实和徐孔他们在世时的作用，体会更强烈了。

徐孔对《炎黄春秋》走向起到的重要作用，还在于关键性地选用人才。吴思人民大学毕业后进入农民报，直接就到徐孔手下当编辑记者。后来徐孔常笑说，在农民报时，吴思随他出差，早上睡懒觉，他去给吴思打开水。1989年后，吴思离开《农民日报》，曾加入《桥》杂志，被停刊后，主要精力用于历史研究和著述。吴思回忆说，1996年一次见面时，徐孔说他们一些老报人白手起家办了一份同仁刊物，说：“你到我们那儿去看看”。吴思说“好”。过几天徐孔给吴思打电话：“你抽时间来看看，帮个忙。”吴思说“行”，但正忙着写《潜规则》，没及时前去。过半个月徐孔又打来电话，笑说“你小子架子不小啊”。吴思一听，赶紧第二天就往《炎黄春秋》跑。他没想到，到了门口，竟看到徐孔、杜导正、方实，三个老头儿站一排欢迎他，依次跟他握手，他简直不知所措。徐孔向杜导正和方实介绍吴思，方实说：“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就这样，吴思进入了《炎黄春秋》。那时，《炎黄春秋》已是较受读者欢迎的敢于直言历史真实的刊物了。

徐孔虽然是《炎黄春秋》的总经理，但也负责终审稿件，经常大堆地编看稿子。随着社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越来越高，对言论自由的追求越来越强，这方面讨论越来越受到关注，刊物逐渐向现当代政治、历史的内容转型了。作为有右派经历的知识分子，徐孔对于开拓言论自由的局面，有很高的自觉性。同时，在保护刊物生存方面，他也有很强的自觉意识。多年里，《炎黄春秋》被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或炎黄文化研究会找去听指示或受批评，常是徐孔出面前往，2008年后才改由吴思去。所以，讨论选题时徐孔很开放，审批稿件时他又很慎重，既谨小慎微，又不横冲直撞。他看稿宽容，只要编辑不粗糙，政治强度上能保护住杂志，从不为难编辑。但对编辑的工作粗糙，他非常不满。吴思觉得，徐孔很有眼力，对于稿子的价值判断，用哪篇不用哪篇，他们看法往往一致。徐孔是主

张吴思接任总编辑、法人代表，因为他觉得吴思有思想而且敏锐，有锋芒但不莽撞，能与舆论管控部门回旋，即坚持杂志导向又保护杂志安全。

徐孔把吴思找来后，1998年，杂志为提高质量，改为执行主编制。吴思在自己编的刊稿中，把“陨星篇”“人海浪”这类栏目名称，改为“求实篇”“人物志”这种价值中性一些的名称。徐孔等几位老人都赞成，大家陆续都改了过来。2007年，吴思看到一篇谈民主社会主义的电子版文章，认为很有思想价值，但担心涉及敏感。因为当时他编的稿子归由徐孔终审，他就先请徐孔定夺。吴思说，那篇稿子，徐孔认真地看了一上午，做出决定，对吴思说：“我看行！你也给杜老看看吧。”吴思又送到杜导正那里，转述了徐孔的意见。杜老看后也明确说“可以”。于是吴思联系作者谢韬同意后，以《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为题，刊发在2007年第2期《炎黄春秋》上。这篇文章造成了有冲击力的思想影响。在杂志向民主政治类型转型的过程中，徐孔始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坚力量。

徐孔主张稳步办刊，坚持“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老套办法。吴思曾在《桥》杂志参与过市场运作，向徐孔提出这方面建议。他不采纳，认为走市场做推广，得铺资金，一本没卖就先花几万元，《炎黄春秋》花不起，始终坚持老派的朴素风格传统做法。连每期封面的颜色，他都亲自决定。张晓鸥对封面颜色和版本提过几次意见，建议风格转为现代一点儿，徐孔总是一句话就给他怼回去。那时候他们都觉得，这老头儿在这方面可真固执。但现在回过头看，他们都觉得徐孔是对的，“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办刊方式，适合以中老年人为主的读者群，也适合以历史真相深度纪实为主的刊物内容。

从《炎黄春秋》创办初期，徐孔就叫张晓鸥去帮忙，他直到办了退休才去。张晓鸥去那里第一件事就是在徐孔等老人的支持下，办起了《炎黄春秋》网站，并成功地在网站开设了《炎黄论坛》，成为那些年言论自由的一个重镇平台。徐孔并不是性格固执，对大家提出的许多建议，他都能接受。张晓鸥到杂志社的第二年，根据来稿多且好稿多的情况，建议刊物增加页码，提高售价，扩大内容量。徐孔对此非常赞同，在社会委会上获得同意，马上实施。

1999年底，在《炎黄春秋》需要加强财务管理的时候，徐孔托人请胡竟成来做财务顾问。那之前，胡竟成是原轻工业部所属的食品报与美商合资公司的负责人，懂财务。他说，徐孔在食品报当总编辑时，主管编辑部，并不熟悉他，后

来出于杂志社生存需要，把他找来帮忙。他帮着把杂志社的财务记账从事业科目改为了企业科目，达到了税务局的对接管理要求。于是，杜导正和方实找胡竟成谈话，请他留了下来，改任社长助理。胡竟成说，《炎黄春秋》的经营管理财务后勤，一直都由徐孔主管。他管得很“抠”，签字报销卡得很严，曾直言无忌地顶住过不合理的财务要求。他要为《炎黄春秋》攒家当。胡竟成认为，徐孔的严格管理，给《炎黄春秋》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财务基础。

徐孔对年轻人很尊重。一次徐孔误会了李晨，李晨生气地说：“我不干了！”扭头就走。那之后，每次李晨来办公室，徐孔都溜达进这屋来晃一会儿。见李晨不理他，悻悻转去。终于有一天，他走到李晨桌旁，在李晨头上轻轻打了一巴掌。李晨心里想笑，站起来却说：“你不跟我道歉，还打我！”徐孔“嘿嘿”笑着，转身走了，这是给年轻人当面道歉了。李晨说这老头儿有时候像个大男孩儿，童心未泯似的。王海印半工半读的时候，徐孔还不认识他，听说他在念书，就想帮他，请他录入手抄书稿，个人付劳务费给他。非典时期大家分批上班，但徐孔却是全勤。那期间《炎黄春秋》租了一辆小夏利，由王海印接送徐孔和上班人员。徐孔对杂志社办公室不放心，担心出问题，说没事儿也得去“看摊儿”。

## 五

2010年5月22日，徐孔去世了。8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一书。在书里，他记录了个人苦难的成因、苦难的过程和对苦难的思考。他说：“在政治运动中，人们难以掌握自身的命运，但可以掌握自己行为的准则和对运动所持的态度。”“我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注重气节，有自己的良知，有独立的人格。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纵使身处逆境，仍不失做人本色。当然这样，很可能要付出代价，甚至是沉重的代价。”正是因此，徐孔付出了二十年岁月的沉重代价。但是他坚持用“直言无悔”四个字，他在为人格呐喊，在为良知张目。

徐孔被打成右派时，他的妻子徐宝珍只有21岁。为了不影响妻子和孩子，当时徐孔写信提出离婚。但徐宝珍回信说，我了解你，你遭受挫折的时候，我会更关心你，不同意离婚。徐宝珍原是县教育局的干部，反右运动时曾是年轻的积极分子，丈夫被划右派后，她却成了审查批判的对象。因为她不见风使舵，更不

趋炎附势，不和右派丈夫划清界限，被开除了团籍，下放到农村当小学教员，幼小的孩子都不能带在身边。丈夫被送去劳改，被遣返当农民，使家庭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但她二十年没说过抱怨徐孔的话，反而曾要求去劳改农场，和黑五类丈夫一起生活。她对徐孔说：“你能忍受的我也能忍受。”

在《直言无悔》一书中，徐孔说：“反右根据几句话、甚至一句话不说，单凭思想也可以定性……掌握权力者是决定因素。”徐孔的命运说明，一个从上到下都可以由掌握权力者给人罗织罪名并加以迫害的制度，那时已经成熟。极权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本能地控制人的意见、价值和信仰。真正的知识分子必然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种制度就必然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必然产生诬陷整肃管控迫害知识分子的掌权者。

吴思在推介《直言无悔》一书时，计算了徐孔因直言而付出的代价：“二十一年右派，其中十年劳教，工资四去其三；十年返乡务农，工资全无。如此而无悔，良心价值几何？——读这本书，可以算出良心的底价。”这是一位右派付出的代价。那么，这个国家，因为整肃一代右派的直言而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呢？应该说，对反右运动给中国的自由所造成的破坏和伤害，怎么估量都不过分。一个民主制度下能够免除恐惧的正常社会，人可以自由思想、自由言论，不会因为直言而付出代价的。刘震云读过《直言无悔》后也说：“直言就是有一说一。作者这一代人，用青春和生命证明：有一说一不容易……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

徐孔的长篇小说《朝鲜战事》，书名是在多次推敲后，吴思帮忙起定的。徐孔对此欣然接受。他写的自己右派经历的书，吴思也曾提出几种弱化价值判断的书名，但徐孔坚持不改，就叫《直言无悔》。他是想表达他不低头不恐惧也不改变的人生信念。他说：“尝遍人生百味，我懂得了做人的一条最基本的准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自己的良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更不能像皮鞭抽打下的陀螺。”

徐孔也曾迷失过独立精神，把共产主义当作真理，为之投入。经历了二十年右派命运后，他逐渐看清了共产主义的性质，于晚年投身于求真求实的《炎黄春秋》，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民主宪政的实现，默默地发挥生命余热。他去世后，我受托为他写生平，看到了他的档案。在一份1945年进入共产党队伍时与领导

谈话的记录中，他说：“如果真理在这里，我便无条件地为真理服务。如果真理不在这里，我还可能到别的地方去。”右派徐孔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年轻时的立言，在苦难中坚守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强权下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大家商量决定，把老头儿的这句话，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徐孔是抱着中国有望自由的期待离开我们的。但是，老头儿没想到，在他身后，统治者倒行逆施，竟视真话为妄议，诬直言为谣言。他所钟爱的《炎黄春秋》杂志，也被强行侵夺了。

徐孔结束二十年右派生涯，重新工作的第一天，我和他认识。徐孔放下操劳了二十年的《炎黄春秋》，我和他永别。躬逢末世，白云苍狗，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倏忽之间，墓木已拱。我与徐孔，睽隔竟十年矣。生前既不可料，身后又不可期，呜呼哀哉，感之慨之，祭之奠之。🕯

2020年5月

【人物】

## 军中一霸

——我知道的罗瑞卿大将

刘家驹

建国之初，战争还在继续，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急需整饬，罗瑞卿出任公安部部长对付暗藏的敌人，得到全党的认同。他是继李韶九、邓发之后，毛泽东最器重的肃反能手。1955年全军授衔，罗战功无多，毛感念他竭尽心力地防奸锄奸，剪除异己，钦笔圈点他位列大将。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罢了彭德怀的官，让林彪主持军委，给了罗更大的信任，赋予罗出掌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八大要职，前所未有地由他一人监军。

—

老军们历来视罗如鬼神。我从口述军史的老兵那里得知，罗的杀人是职业性的，斩除AB团时，他已是红四军政委，红四军一夜间砍杀了1800多人，罗是握持刀把子的。长征路上，他任一方面军保卫局长，为了给部队行踪保密，凡走不



动的伤员都由他处决。军史当然不会记下他这些“除恶务尽”的“业绩”。

战争年代，军队有句流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干部来谈话。”成千上万的“耳目”“线人”遍布党政军，政权维稳就靠这班人，罗是他们的头领，谁不生畏？他主持公安部后，决心将首都建成七无城市，誓把地富反坏和苍蝇蚊子老鼠一起清除。骇人听闻的克格勃手段，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有人称罗是中国的贝利亚。

有一则秘闻，凸显罗对毛泽东的赤胆忠心。

1962年1月，为平息全党对毛大跃进的愤懑，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县团委以上干部七千余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常委们商定，要开成政治退赔的大会，共同承担大跃进酿出的苦果。到会干部，有人对毛的暴政已怒不可遏，在会场的墙角边、地毯上写出“反动”标语，号召大家都来反对“秦始皇的暴政”。

罗要抓现行，周恩来以他党内斗争的智慧，婉转告诉罗：“你抓谁啊，都是些娃娃干的嘛。”罗心领神会，让人悄悄抹去了反标。如若让罗大显身手，给七千人来一次大清洗，那个“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化解矛盾的氛围，也许会变成又一篇格杀AB团的血腥历史。

## 二

1964年元月，我在南京第一次见到罗瑞卿。我对他是高山仰止，可连说话的机遇都没有，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浑身的霸气。

当时，我军创造的“郭兴福教学法”已引起总参军训部的重视，先是叶剑英元帅在1963年从《军训杂志》看到郭兴福的教学法，当即指示分管军训的副总长张宗逊到南京考察。南京军区特地给总参考组在镇江181师的训练场组织了现场会，许世友司令还招来全区师以上干部观摩。在观摩会上还出了一个插曲：年近花甲的许老总，兴致勃勃地披甲上阵。他演示二百米内硬功夫的冲击，可是一跑起来，步履蹒跚。投出的一颗手榴弹，由于臂力不足，那手榴弹在许跑动的前方十多米处爆炸。许不顾自身的安危，迎着乱飞的弹片继续前冲。许老总人称“许和尚”，少年时当过少林寺的炊僧，有八年的少林武功。参加红军后，当了敢死队长，光用大刀片就打了78场仗。现场会上，许老总老将不减当年勇的举动，让全场观众惊愕又赞叹。



现场会之后，叶帅又亲自观看了郭兴福的教学演示。他热情洋溢的给毛泽东报告说，郭兴福是运用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把兵练活了。郭兴福所教的兵，个个都像小老虎。毛极为欣赏“小老虎”三个字，批示罗瑞卿，要他亲自过问，抓好典型向全军推广。

罗不熟悉军事训练，但他很用心地听取了张宗逊的汇报，又看了郭兴福教学的军教片，还让到过现场的叶帅秘书谈观感。随后，他很快作出决定，由总参出面组织一次全军性的现场观摩会，推广郭兴福的教学法。要求各大区、军兵种、野战军分管训练的领导参加，三大总部也要来人。

这年春节刚过，各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都来了南京，到会的将军就有200多位。罗到的当晚，军区组织晚会欢迎，老军们难得欢聚一堂，一见面，我军原始的生态文化在他们身上马上显现，见面礼就是相互骂骂咧咧，拳打脚踢，先叫着对方“狗娃子”“二赖子”之类的小名或外号，接着骂道“你还没死呀！”说着，照着对方胸口就是一拳。对方回敬道：“你他妈的也快活够数了吧！”边说边抬腿踢过来一脚。有的拧耳朵、刮鼻子以示亲热，都忘了自己的将军身份。正闹腾着，突然有人高喊：“罗总长到！”顿时，全场鸦雀无声地起立，屏息四处张望。罗从边门进场，他身材伟岸，近一米九的身躯比走在他后面的许世友司令要高出半截。罗这年58岁，步伐矫健，身上发出一股煞气。将军们都用畏惧的目光注视着他从通道走过，又目送他走上舞台的中央，许世友跟他上台后，见大家都傻着眼，大声喊道：都欢迎鼓掌呀！这时，老军们才如梦方醒，响起掌声。

我见过毛、周，也见过帅字号的叶、贺，他们出场时，被接见者的眼光是亲切的、兴奋的，从未见过罗上场时的这般肃穆和令人生畏。我猜想，罗一生大都在军队里干克格勃，老军们心目中总是有消除不去的畏惧。

许老总致欢迎词，几句话：今天欢迎罗总长，欢迎各位老伙计光临南京军区，没有好的招待，有鸡巴毛炒韭菜……

当年四方面军失败，许世友逃到延安，毛泽东清算他，说他是张国焘反中央的伙计，他一气之下要拉杆子上山打游击，中央判了他一年零八个月的刑，他一直不服气。在罗大将跟前敢如此放肆，全军上下恐怕只有他一人。

罗瑞卿讲了15分钟，说毛主席要他来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就是要摒弃苏联教条主义的军事训练，提倡我军的传统战法，让光荣的传统开出新花。

罗讲完话，由话剧团演出《东进 东进》。一个半小时的演出，人们都屏息看戏，没人走动，没人说话，连个咳嗽都没有。

### 三

先说说“郭兴福教学法”的形成。

1957年批判刘伯承元帅的“坚决的，不走样地把苏联老大哥的先进军事经验学到手”的教条主义，1959年庐山会议彭老总下台，林彪主持军委，深知要巩固毛在全党、全国、全军不可动摇的地位，必须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军训上要总结历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战场经验，形成以我为主的教学内容。李德生遵照军委精神，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带领他的军训班子在训练场摸爬滚打忙活了几年，创造了以郭兴福命名的教学法。

我常年跟随郭兴福，是李德生的指示。他要政治部经常了解这一训练模式的新动向，同时对已具有影响力的先进典型要做好宣传。从此，我伴随郭兴福和他的示范班走南闯北。

郭经历过战争，教学有创造性，李德生对他又言传身教，把他多年总结的战场经验都融进了郭兴福的教案。“郭兴福教学法”刚向部队推广，就引起强烈反响，军报不惜篇幅宣传，广州、武汉、沈阳等军区都相继邀请郭兴福去演示，观看者都肯定它是我军成功的训练方法。

郭带的演示三班，和当时所有部队的状况一样，战士的军龄一二三、四年的都有，文化从文盲到高中，性格特征，有笨的、有聪明的、有傲气的、有懦弱的……郭通过因人施教，循循善诱，在几个小时的教学中，就把一个科目的全部内容灌输给了战士。郭的讲解生动活泼，把枯燥的军事课变成了一堂富有情趣的战斗技能和思想教育课。

老郭示范动作规范，语言幽默，他抓的“活思想”，就像演小品一样在“抖包袱”，让参观者能发自内心的欢笑，连常年在训练场摸索的行家们，都深感郭的教学很了不起。

现场会怎么开？不听经验介绍，只看教学表演。

教学表演安排在南京步校的战术训练场，出发前，老郭有些心神不定，告诉我，他一早起就跳眼。我说，挑眼是跳财，你是在跳胆了。面临这么大的阵势，

我担心他怯场。

表演场警卫森严，两百多将军戎装整齐地坐在山坡的小马扎上，几十名记者的相机都对着罗总长。郭兴福在场中整理好队伍，跑步到罗瑞卿跟前：“报告总长，郭兴福教学示范准备完毕，请指示。”罗从马扎上站起，一挥手：“开始吧。”

郭回到队前宣布了科目，科目是单兵进攻。作业刚展开，郭一回头，发现罗不知什么时候正紧跟在自己身后，他像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前不久，叶剑英元帅来观看表演，也是紧紧地跟在他身边。叶帅眼花耳背，他要看清动作，几乎把自己身躯贴在地面去看郭兴福卧姿示范，边看还边问，郭从未感到丝毫紧张，反觉得老师是对自己认真地关注。现在，罗总长的出现，他身上像冒起鸡皮疙瘩，讲解开始哆嗦，表述结巴。我坐在记者席上，见他出现慌乱，心顿时悬到了天上。

去年，郭在哈尔滨给23军表演，一天演示两场，把老郭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跟着他的师政治部副主任警示他：你就是趴在演练场上，也要坚持下来。今天的沉重已不是体能的匮乏，而是罗大将像块泰山石，重重地压在他的心上。

单兵进攻，郭兴福已演示过几百场，这是林彪倡导刺刀见红的二百米内的硬功夫，山坡野地就是训练实战的课堂，十几个技术动作，经他细化成生动活泼的教学语言贯注给了战士。前些年，部队推行苏军的战斗条例，把士兵当成战争机器，教练冲击时，没头没脑地勇往直前。郭的教学法富有人性，他让战士懂得如何处置战场的复杂情况，学会在生死存亡关头必备的技能，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它的内容包括战士从出击地位开始冲击的运动中，如何善于保存自己对地形地物的有效利用，如何快速地卧倒出枪射击；什么时候投弹，什么时候与敌人展开肉搏，以及自我的防护措施。一招一式，郭兴福都要耐心的边做动作边讲要领。他的动作规范令人赞叹，如球星手脚功夫那般娴熟。

罗总长寸步不离，郭兴福每做一个动作都像受到牵制。郭最怕罗大将那双眼睛，像无数的钢针扎向他的后背，他表述的语言越来越晦涩，示范的动作也越来越僵硬，操作手中枪像是在拨弄根铁棍。如果此时，罗能像叶帅那样不断向郭兴福提问，郭的心情会得到舒展、放松，教学会做得有声有色。可罗一声不吭，还板着脸，郭兴福在距“敌”堑壕30米处投出了两颗手榴弹，弹体却没有落进堑壕，郭兴福看到了罗的眼里像有火焰燃起，顿时浑身冒出虚汗。他顾不得罗的反应，继续冲刺，做出抵近射击、搏斗、拼刺一系列的动作。这些动作看起来是一

气呵成，但都给他紧张的情绪简化了，内行人一看仅是走了过场。教学演示结束，坐在山坡上的将军们如释重负般响起稀落的掌声。

郭兴福忐忑不安的整理好三班的队列，转身向罗报告：“总长同志，我的教学法演示完毕，请指示。”

全场静下来了，一大群记者向罗总长跟前围了过来，罗的怒火喷发了：“郭兴福，我要问你！”

郭挺胸：“请总长批评！”

“你是不是把你准备的教案再背诵给我们听？你的教学法提出对敌人要稳、准、狠，你的示范哪一件做到了？你的示范班战士，是不是从营、团挑选出来的尖子？你投的手榴弹为什么落不到堑壕里？拼刺仅三晃两晃就敷衍了事？……

罗瑞卿一连向郭兴福提出了17个为什么！

郭兴福象遭到五雷击顶，血在脸上涌动，呼吸急速，愣愣地站在那里。许世友疾步过来打圆场说，今天这么多老总看，紧张了，重来嘛。

罗一甩手：“我再也不看了！”他大步走到演习场路边，登车走了。

全场的将军们都在惊愕中默默地登车回城，记者们也愣住了，许世友、李德生也灰溜溜地上了自己的车，演练场没有了声息。

郭兴福回到招待所心情沉重，吃饭睡觉，一声不吭。我对他没有任何指责。他的错是压力下的失常，批他哄他都无济于事，只能让他自己反思应对。第二天，我见他缓过些劲来，才问他：你怎么就沉不住气呢？要是毛主席来看你演示，你不吓瘫了吗？

“老刘，”郭敞开心扉，“说实话，谁来了我也没这么胆怯过，就是他，全军的大将小将，谁不对他敬畏三分？”

“为什么？”我故意问。

“他是个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我是随时准备挨宰的。”

我清楚地知道，郭是旧军人出身，党的阶级路线给他设了一道坎，当了四年副连长得不到提升。

#### 四

郭为人处世，生活上大气，政治上慎微。我和他相处几年，亲密无间，还经

常下馆小酌，他对我蛮讲义气又推心置腹。也许我是文化人，和他感情上相惜相近。我们到各大军区巡回演出，通常由南京军区、12军和下属的师、团派出得力干部对郭进行监护管理，组成临时的支部，我也是支委之一。师、团来跟他的领导，对郭日常生活言行举止要求极严，因郭已是全军的典型，他的表现好坏影响到师、团的声誉，差不多每次开支委会，他的师、团领导（副主任或副政委），总要把郭身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掏出来三道四，我却处处维护郭，反对他们对郭的非原则性的一切指责。他们也知道我的来头，是李德生点名派出的“红人”。的确，每次郭外出演示回到军里，只要见到李，我总要对郭在外的表现和反映说些情况。

有一次，我向李德生提出，在郭兴福身边，不要配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郭因此对我更加信任。我在连队摸爬滚打10年，我们之间有深厚的共同语言，他胸中一有块垒，就直不笼统都倒给我。多年来，他在部队生活一直是感到自己处在被监控中。军队的阶级歧视政策如背负的枷锁。比如直系亲属中有宪兵、特务、保长、会道门头子及海外关系的干部，表现再好，一般都会打入另册或被清除，这是郭兴福最耿耿于怀的。他认为，自己现在虽是全军的典型，只不过是因他的一技之长被利用而已。郭还知道军队有严格的成分区隔，地主出身的干部，允许留下0.8%，中农小业主出身可留2.4%，在旧军队干过两年的都不得提干，这更伤害了他的感情。似乎自己一生的命运都被罩在一个铁笼子里。我同情他心理的重负，我的职责不允许我和他一个鼻孔出气，只能是劝导他超脱，他的教学法已有群众基础，要他审时度势，只能奋发向前，自暴自弃只会伤害自己。

## 五

由于“郭兴福教学法”已在广州、武汉、济南、沈阳几个大军区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充分肯定，来参加现场会的几位大区领导一再向罗总长劝说，毛泽东又有批示，罗不敢轻易半途而废。他见求情说项的人越来越多，也就顺水推舟，表示不走了，再看一回。

李德生的训练班子全都出动做郭的思想工作，郭兴福也表示要拿出最大的勇气再给罗总长演示。这天，演示场跟往常一样，参观的将军，记者都是原班人马，不同的是罗大将坐在前排的小马扎上，再也不跟班“作业”了，郭似乎也消除了



畏怯心理。他一上场示范就意气风发，几乎一气呵成。会场上不断发出赞叹和掌声，这气氛让罗瑞卿平板的脸上也出现笑意。演示结束，罗兴奋的大步走到郭兴福跟前，紧紧地握住郭的手说：“很好嘛，我军就要你这样的传统练兵方法。”

罗转过身，对跟在他身边的李德生说：“你为全军做了件大好事，毛主席也高兴。”

罗总长回到中山陵住所，马上挥毫给郭兴福提了“戒骄戒躁，精益求精”八个大字。字不入流，经军报刊登，产生了巨大的政治效应，“郭兴福教学法”响遍全军，老郭很快就被任命为南京军区步校教研室副主任。

这天，郭也兴奋，他买来一瓶白酒一包花生米，我俩对酌畅饮，一扫他头顶上的乌云，熠熠的光环又开始升起。他怎么也料不到“文革”中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他的全家集体自杀。

现场会的第二天，在各组的讨论中又冒出了个“大”问题。这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日，成都军区小组在韦杰副司令的主持下，一致认为，郭兴福的教学法好，最好不要用郭兴福个人名字命名，郭有创造性，可他是旧军人出身，而且还是吴化文的汉奸部队过来的，用这样的人当典型不合适。（注：吴化文在济南起义作用巨大，减少了军民十数万人的伤亡。吴起义后仍然让他带领我军35军攻打南京。）

常年抓阶级斗争的罗瑞卿十分清楚，用旧军人塑造我军先进典型是个敏感的难题。他马上召开区组长的汇报会，到会的有七大军区的领导和军兵种的负责人，还有几位是中央主要报刊的记者，我也忝列末位。

会场在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AB楼。会议由罗瑞卿主持，大家不知来开什么会，罗的开场白是：“今天请大家来，有件事要说说，我也要听听大家的。”

“有人说，郭兴福出身旧军人，当典型不好，我们说他是一个优秀教练员都不行吗？韦杰，你说说，你们是怎么看的？”

这位壮族中将在朝鲜战场上是60军军长，他的180师给美国人连锅端走，要不现在已是大区司令了。此刻，总长点他的名，他听出了话外有音，站起来嗫嗫嚅嚅地说：“这是我们小组一部分人的意见，不一定正确。”罗面无表情，对韦的回答显然不满，没和他争辩，转过头，问坐在他近前的粟裕大将：“粟裕同志，你是我的前任，你说说。”



粟裕速即站起，像下级在面对上级，身躯挺得直直的，说：“我在总参时，分管训练是叶帅，我很少过问。”

粟裕答非所问，但很得体。他来参加这个会，到现在还没弄清罗的用意，他精明地采取回避。他回答的话音很轻，还带着微笑，说罢，慢慢地坐了下来。

粟裕是我军名将，他和林彪被国外的军事年鉴列为二战后优秀将领，淮海战役是他提出要打的，毛泽东非常赞赏他的指挥才能。建国之初，他接替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出任总参谋长，1957年反教条主义，彭德怀把他整下台，林彪上来后，惺惺相敬，三北地区和沿海的防务经常倾听他的意见，这次来参加现场会，表现了他对林主持军委的支持。

罗又问了几位组长，都唯唯诺诺的，说什么“我们小组意见不大，听中央的”，或“成分不好重在表现嘛，请总长定了就是”。

罗深知老军们口是心非，他又点开了名：“赵章成，你不也是举起手过来的吗？”罗出人意料地放言，在座的将领们面面相觑。赵章成是炮兵副司令，一听总长点名，猛地从沙发上站起，红着那张大麻子脸，惶惶地望着总长，嘴皮在动，听不到声音。

早在1931年，我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后，正处在极困难时期，赵章成追随董振堂、赵博生在宁都起义，长征时抢渡大渡河，他是红一军团的炮兵营长，在泸定桥打出了三发炮弹名扬全军。罗说他是举起手过来的，让他一脸尴尬。

罗继续展示他的威仪，又连连地点名，你，怎么过来的？还有××，你不是给打散了，拽着我们的马尾巴跟着走的吗？

可以说，到会的将领们半数都来自国民党，包括罗大将自己。罗为什么糟践人？这时，我怎么也想不到，他讲起了南昌起义，说：“我军就是从国民党军分化出来的，为什么容得下自己，容不得别人？”接下来，罗发布：“教学法是毛主席肯定的，必须紧跟照办，推广执行，郭兴福的教学法是优秀的，郭兴福本人是优秀的教练员，值得全军学习。”

在阶级斗争盛行的年月，总长这番话平息了一场风波，也像一股清新的空气，吹开我们淤塞已久的心扉，我对罗有了好感，亲切地叫他“政治总长”。

## 六

我第二次见到罗瑞卿是这年的秋天。

为防止美蒋从我国的蜂腰部登陆，军委急令12军移防苏北建设海岸防区。

有六万平方公里的苏北平原，应对战争无险可守，中央军委决心要在这里筑成一道马其诺防线。从1962年春开始，我们军五万人投入筑城。广阔的黄海滩一片荒芜，无淡水，顶海风，住帐篷，冰冻三尺也不停歇地施工。

我军进行海岸防御是个新课题，大管家罗瑞卿在徐州召开济南和南京两大军区的协防会后，要来苏北视察12军防区。

得知罗总长要来，从军部机关到基层连队，紧急动员清洁营区，整饬军容风纪。总长每到一个点看什么，见什么人，见的人该说些什么？都要由师团组成的接待班子来精心安排。对住在海边的一线部队，还作出特别规定：凡罗总长经过的道路上，每一百米要设一警戒哨，哨兵必须有两年以上军龄，五官端正，身高1.75米，初中以上文化，军人举止标准正规。目的一半是保卫，一半是向总长显示我们军士兵的素质。

罗总长一行由军长李德生陪同从徐州飞往盐城，又从盐城北上经射阳河口至滨海，沿线都在构筑各种海防工事。要是你站在海堤上眺望，已建成上百座的阵地，星星点点遍布一望无际的盐碱滩上，煞是壮观。所建的工事都是永备性的，由两个工程团夜以继日地忙活。李德生焦虑地向总长报告：“海滩上建成的工事年年在沉降，十年八年就不管用了。”罗总长看了两处，他提不出任何技术措施，也不做任何解释，就斩钉截铁地对李德生说：“你们就一直修下去，沉一个再修一个，直修到没仗打为止！”跟总长来的部长、专家都沉默不语。

罗总长的话，令人心情振奋，大家认为总长的意志就是浇铸在我们心中最坚强的工事。其实我军有不少军事将领和罗大将一样，对现代战争的防御不得要领。1962年，我到福建前线去参观友军坑道工事的构筑。军区的作战参谋告诉我，这里的工事都是军区的×副司令来定位的。副司令每到一地，只要他看中打洞的地位，总是捡起一块小石头扔到山坡或石壁跟前，指示你从他石头的落点处开掘。一次，有位副师长向副司令提出，要是从你指定的那里往里打，坑道得多掏好几百米。副司令说，我定了，谁改动也不行。领导人一言堂，造成的浪费惊人，好些工事未经勘察就动工，冒顶、塌方、透水又无法补救，修成了也就废了。那些年，我军的海边防的防御体系花了两千一百万个亿。当时，举国上下正处在饥馑的年月，这位参谋还给我算了一笔账，如若在三年灾难之时，把两千一百万拿出一

半来分给他们，每人至少能买到几千斤瓜菜代填肚子。

罗总长被列为军事家是名不符实的，他对战略部署是外行。在解放战争时期，罗是杨罗耿兵团的政治委员，他是靠抓阶级斗争慑服干部，军事上无大作为。这次来苏北，他却带来水利部长钱正英和他大胆的战略设想，意图在我军防御的两百公里的宽面上凿出一条像运河一样的水干渠，用以阻止敌人登陆后坦克和摩托的机动。

幸好这一劳民伤财的浩大工程未得到实施。多年后，南京军区一位老参谋告诉我说，罗总长当年认定苏北海岸会成为诺曼底是忧天之举，把数百亿军费在黄海滩上打了水漂。从游击战争中练出的将领们不懂得液态战场，紧傍苏北的黄海几乎是浅海，大型舰船根本无法在这片海域活动，即使用小型舰艇载人载炮上岸，苏北地区公路稀少，水网密布，战斗部队展开还有多大的机动能力？这一不知现代战争常识的防御部署，竟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他批评了林彪“北顶南放”的方针，肯定敌人会从我国的腰部进来。

1986年我重访故地，海滩上当年我们所建的阵地都已失去战争功能，下沉得几乎只在地表面留下一个个白晃晃的壳顶，很像烈士陵园的坟茔。

## 七

罗总长来到陈家港。这里驻守的是35师106团，他要顺便查看防区的设施和部队生活状况。

这天清晨，晨雾刚散去，罗总在海堤上漫步，发现前方站立的哨兵英姿挺拔，兴味盎然地走到跟前，询问这位哨兵的姓名籍贯年龄，和部队的的生活状况。每问一句，哨兵的回答不仅简明有力，还有股虎虎的生气。总长最后问：你每天守望大海荒滩，苦不苦？

哨兵挺胸昂首：“苦，我们吃了苦，老百姓就少吃苦。”

这都是事先编导排练的，罗总长却被哨兵“崇高”的思想境界感动不已，他欣喜地对身边的李德生说：“我们就要这样的战士，这就是我们的接班人！”

总长的话立竿见影，几天后，这个战士得到了提升排长的任命。

罗用了5天的时间，对我海边防200多公里的正面防务逐点地查看，视察结束，还要临幸我驻淮阴的军部。

为迎接罗的大驾，最忙的是政治部，要承担起对罗的安全保卫。罗住地委招待所，地委驱赶了上上下下来往过客，由我们派出一个警卫排24小时封闭式地护卫。罗的一日三餐，由地委找来两位出身好、手艺精的厨师做。我们的保卫干事，一直盯在锅台灶间监视，每做出一样菜都先品尝留样，为下毒事件提供依据。锅盆碗盏，顿顿要做到开水消毒，门厅、走道由我们医院派人天天用喷雾器杀菌。

我们给罗吃的是些什么？那年月，困难还未消除，我们军队干部要优于地方，每月配给一斤肉，一斤黄豆，半斤白糖，能吃饱就算吃好，给罗大将弄来的土特产有宝应的双黄鸭蛋，洪泽湖的水鸭子就算最珍贵的了。到了后来邓小平主军时期，吃喝风的档次大大加码，刚进入政治局兼总政主任的杨白冰，他到南京军区视察，一席酒宴8千元，吃穿山甲。南京市委更上一层楼，招待杨吃一万二的熊掌席。应当说，罗在吃上没有苛求。

这天中午，李德生突然来电话，要我们给罗总长安排观看淮剧演出。李的指示让我们既惊喜又惶恐。罗在军委管军管政还管文，他对看过的电影、戏剧、小说，大都会即兴发表些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评论，并且经常警示我们，军队文艺时时处处都要防范封资修的侵蚀，看过后，他说好，就相安无事。如引发他的一通批判，我们就会背上一辈子的黑锅。时间紧迫，容不得我们瞻前顾后，军政治部马上召开由秘书、保卫、文化三个处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我们文化处提出，赶快去购买几十张今晚的票，让罗总长和群众一起看戏，老百姓肯定会欢迎的。保卫处坚决不同意，说罗总不是一般的中央首长，他有特殊的保卫规格，警卫失控，出了问题谁负责？秘书处长说，首长安全第一，我们去找市文化局，让剧场挂牌退票，由军队包场。主任如释重负，拍板赞成。

保卫处忙活开了，调来工兵连在剧场里里外外探测是否有人埋设地雷，探完了，让警卫连派人看守场地，不准闲人出出进进，保卫处长一直在现场督阵。

我们处的任务是到淮剧团审查剧目。他们上演的是三个现代小戏，其中一出叫《摘棉花》，写姑嫂俩在地里摘棉花，边摘边夸自己的女婿，老公公爬上树偷听，嫂子告诉小姑，说公公一心想抱孙子，你哥哥白天黑夜追着我要个小子。唱词中有句“性急得上床连脚都不洗”。当时，连《柳堡的故事》这样的纯情影片都在部队禁演，这类有伤革命文艺“风化”的台词，更是不能容忍。我向编导提出抹去或换这句台词，编导不干，说这句台词是全剧的戏眼，没有它不成其为戏。

我回来向处长张星汇报，他说：“要尊重艺术规律，有点情趣不碍事，我来承担责任，让他们上演。”张在我们政治部很有人望，在延安时期，他就是鲁艺的乐团指挥（后来周恩来提出组建东方歌舞团，他出任第一任团长），他的表态，给主任吃了颗定心丸。

剧场的票已售出，要观众退票遇到了麻烦。观众到开演前才知道，闹开了。剧场经理和工作人员一起出动劝解，又不敢说明真相，眼看快开演了，我们的秘书处急了，赶紧招来警察驱赶，还派出一个连实施戒严。平时剧场前欢声笑语的小广场，马上森严壁垒，如临大敌。

剧场的座位由我们文化处安排。前十排给军的司、政、后机关于部（空第七排给罗一行和军的首长），中十排给淮阴地市首长和中层干部，后十排给军直属连队代表。

剧场是老式建筑，通风差，空气污浊，主任机敏，让秘书处即刻买100把蚊香来改变空气“质量”。这时，警卫连的战士在场内沿墙根密密地站了一圈，主任让他们每人都拿上一炷点燃的香，百十号人手持香火烟雾袅袅，很像庙里兀立两厢的八百罗汉。

八点过，罗一行才进入剧场，李德生随后。我们主任站在舞台的一角呼喊：“全体起立，鼓掌！”罗挥动手臂向欢迎的人致意，军人都循规蹈矩地目不斜视，地方干部却张着惶惑的眼睛看稀罕，还发出一阵嗡嗡的议论声。主任急了，伸出双手拼命往下压，示意大家坐下，静场。

票是我参与分配的，我的一张选择了八排中间，正好在罗瑞卿和李德生座位之间的后面，我是想对罗近距离的察言观色。我的左右自然是两位保卫干事。

罗一人就占了三个座位，大概是喝过头了，顾不得仪态举止，他解开了风纪扣，把头枕在靠背的顶端，仰着上身，叉开两腿，嘴里不断呼出浓烈的酒气。

演出开始，头两个节目是表现雷锋精神的，内容都是好人好事的说教，我观看罗总，他似乎在注视舞台，可能是酒精的刺激，头在晃动，时不时地调整一下身子，也许出于礼节，别人鼓掌，他也举起手拍了三两下。

《摘棉花》是压台戏，女演员是用舞蹈身段上场的，舞姿轻盈，淮剧的小调也优美。我的注意力仍集中在罗的脸上，此时，他已聚起精神，嘴角展现出一丝笑意。当儿媳妇唱到“性急得上床连脚都不洗”时，在树上偷听的老公公开怀大



笑，从树上掉了下来，这时，全场骤然响起一片笑声。罗的反映更为强烈，他情不自禁地笑得前仰后合，还连连鼓起掌来。李德生大概是受到罗的感染，也很兴奋，歪过身来跟罗总说了几句，罗不住地点头，像是在赞许，我绷紧的弦松弛了，对罗的畏惧之心一下变成了敬意。演出结束，罗没上台接见演员，在李德生陪同下退场，全场起立目送。

散场了，我立刻赶到处长家，说出我对罗的观察感。处长却评价不高，说，罗在延安抗大当教育长，他不让学员参加我们组织的舞会，他自己却一次不落地到场，还跳到天明。

第二天上午，安排罗总给军机关和淮阴市、地专的中层以上干部做报告，只两百人，会场安排在地委的小礼堂，扩音、录音由我们文化处设置。八时半，李德生陪罗总准时到场，罗一见台角放的扩音器，马上拉长脸对着正说开场白的李德生吼开了：“谁叫你们搞录音的？我不讲了！”转身就走，李忙过拦住他，解释说：“这不是录音机，是扩音器。”

罗更火了，“你能骗我？我还不不懂？”

罗的震怒，多年后我才明白，他常年处在整我、我整你的上层斗争中，生了疑心病。1954年的高饶事件，1957年的反教条和1959年的反彭黄，批判材料大都来自录音整理。罗一直在整人，也防范被人整。此时李德生尴尬得满面通红，回过头叫我们撤走。

罗的讲话开始就带着一股气。讲起他在苏北半月的巡视，说苏北有海有边就是无防，中央重视不够，地方也不愿防，中央拨的款不多，你们——淮阴盐城都不用它修海堤、补桥路，战争需要的，你们不顾，就顾你们的老窝。一个县城才几万人口，高楼大厦就修了一条街，还给我哭穷。你们庙不穷，和尚更不穷，干部喝的双沟、洋河（苏北名酒）比小孩子撒的尿还多，我走一路，小孩子都拣土坷垃追着打我的车，小家伙活蹦乱跳的，饿死的有几个……

罗批地方，我感同身受，我曾到海边考察了两月。每年台风一来，百尺大浪常常冲毁海堤，海水灌进堤内，把庄稼地浸泡成一片寸草不生的盐碱滩，板车能经过的路桥也多年不修，海边的村落都喝不上甜水，干部只会大吃大喝，不管人民生计，县区忙建楼堂管所。我们对此都深恶痛绝，又无处申诉。罗总是穿着军装唯一能管地方的人，我赞成他的出言不恭。



接下来，他骂开了我们军，说我们去年从浙江移到苏北时，把浙江的地皮刮走三尺（厚）。话很刻薄，他是依据浙江省委状告信中说的，可军委要我们搬家，只给搬迁费，不给安家费，苏北地方穷得叮当响，木料稀缺，一块砖头比三个鸡蛋都贵，我们不得不干些出格的事情。比如，我们在南方建的营房、工厂、环境设施和树木草皮，能搬的能动的，一样不落地搬到了苏北，地方政府来接收，见房屋四壁如洗，没门没窗，骂我们做绝了。

罗总在会上“刮胡子”足足“刮”了我们半小时。批归批，他还是有点人情味。他回去后，给我们增拨了各种经费。

## 八

仅过一年，罗总就大难降临。他骄狂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聂、叶、徐三位老帅群起攻之，说他独断专行，连他最信任的杨成武，也打出翻天印，说他是霸王。叶剑英、叶群、杨成武一起飞到杭州刘庄，向毛泽东告状，说罗与贺龙勾结。周恩来担心罗要谋反，有野心，到处部署对罗进行监控。

毛和林商量，给罗搞了一次大批判。1965年12月8日，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由邓小平主持，没让罗瑞卿到会场，却给罗一生算了总账，会议结束回到北京，不满背靠背批罗的聂荣臻，又搞了一个陆海空三军师以上干部的大会，继续对罗揭批，气势恢宏，我们叫三军升帐。1966年3月18日，斗得罗不想活了，从他家二楼的平台上，往下纵身一跳，两只脚掌同时着地，骨折。

贺龙嘲笑他：“你罗长子跳楼都不会，哪有脚先向下的，要头朝下跳嘛。”

邱会作说他是顺墙出溜下来的。

叶帅赋诗云：“将军一跳身名裂”。

文革开始，罗瑞卿被捆绑进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给文革祭旗。

文革结束，邓小平出山，罗也翻身。一次，在总后观看演出，我又一次见到罗，他一进剧场门，瘸着腿，行动十分吃力，有人要去扶他，他一甩手拒绝，自己从最后一排，沿着走道一步步地挪到了第三排。他顽强的毅力，似乎在向公众宣告，他会东山再起。

1978年夏，他秘密到德国治疗残腿，8月3日，他死在德国的手术台上。握

刀人成了刀下鬼，有人说是报应。遗体运回国，在301医院开设了灵堂，我去了，那天有3000人向他告别，那遗体脸上的表情依然威风又严厉。

罗瑞卿逝去十周年的那天，我正在耿飚家听耿讲长征。罗的夫人郝治平打来电话，说罗的家乡四川南充已为罗修建了一座纪念馆，郝要耿去南充为纪念馆开幕剪彩。耿没有直接表态，只说考虑后再告诉她。耿放下电话一脸愁容对我说：“我们这些人死了都建馆，全国至少得有好几百，到处都是共产党的庙堂了。修这么多小庙花钱且不论，能有多少人间香火？”

我向耿老建议：“你还是不去的好。让孔祥绣（孔当时正在给耿飚写回忆录）给你代笔写篇纪念文章就可以了。”耿脸上舒展了，说：“可以，就这么办。”

接下来，他给我讲起他和罗在战争中的几个小故事：

一、红军长征过湘江，国民党十万大军堵截，一军团在先头突围，战斗残酷激烈，江面一片血红，漂满浮尸。耿是一军团4团团长，正患疟疾，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罗来了，他是一军团保卫局长，他的任务是督战，他疑耿胆怯畏敌，找来警卫排长杨力问：“你们团长是不是装病？”杨说：“确实是打摆子。”罗不信，又找几个干部查问，都这么说。假如当初有一人在罗的威逼下说了“是”，耿马上就成了罗的枪下鬼。

我专为此事去青岛找杨力，他刚从北海舰队司令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告诉我，在湘江边上，罗瑞卿三次找他，都是抓住他的衣领，用枪点着他的脑门：“你们团长是真病还是装病？你说假话我就毙了你！”杨力心地纯正，三次都告诉罗瑞卿“团长确实是打摆子。”我问：“罗对一个团长都不相信？”杨说：“他对谁都不相信，长征一路他处死不少人。有伤员，有开小差抓回来的，还有胆小不敢冲锋的。更荒唐的，我们在战壕里和敌人对射时，要战士露出半个身子，挺胸端枪射击，以显示我军英勇无畏。如谁勾腰，头的姿势低些，他见了就是一枪，说你怕死。”“我是他直接管的，我的任务就是监督团长、营长们是不是执行了军团长的命令。当年，红军中像我这样的警卫排长，权力就是杀人，一切听罗的指令。”

二、解放战争初期，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决定越过平汉线东进。耿是参谋长，一天晚上，指挥所刚穿过铁路，得知敌人上来了两个师，罗认为夸大了敌情，坚持前进，耿主张后撤观察动静。耿对罗不敢硬顶，他把杨得志拉到高粱地里分析敌情，说服杨下决心撤退。他们刚撤过平汉线，敌人果然

上来了两个师。要不是耿的机敏，杨罗耿早就成了国民党的俘虏。

三、1947年的一天，罗瑞卿突然决定召开旅以上的干部会，连杨得志和耿飚都不知为什么开会。旅的干部们都来了，罗突然宣布：“把你们身上带的金银珠宝全部拿出来。”干部们愣了半天，不知为什么罗要这样做，都望着罗那双凶神恶煞的眼睛，不得不从藏在自己身上的袖里、领下、衣摆中取出各式各样的宝贝，有金条、金链、金砖还有钻石，堆在桌上（后来过秤仅黄金就有16.5斤）。罗告诉大家，这些东西全由兵团来保管，以后，你们不得个人私藏（罗的本意是防止干部在危难关头席卷金银逃跑）。有的干部哭了，这些宝贵财产是战场缴获的，各级党委都清楚，这些东西由领导干部保存，是为了在危急关头用于部队的急需，这是战争年代的一条重要经验。罗不顾客观环境，只讲左的政策，极大地伤害了干部们的感情。可他说了算，杨得志说不上话，耿更无能为力。

耿还告诉我，我军有两个霸王，彭德怀是第一霸，罗是第二霸。耿对罗的评价是四个字：刚愎自用。

罗的前夫人叫拱平，在延安时期分的手。1957年给打成“右派”，一直孤居在南京。1990年，《炎黄春秋》初创，我和她有过几年的通信。她赞扬《炎黄春秋》的文章，从不言自己一生的不幸，更不愿以怨妇发声。罗的女儿崇敬自己的父亲，和我争论过罗参与一些历史事件的是与非。她对罗的批评只有一句话，说她父亲的愚忠，害了自己。📷

## 【人物】

# 一代宗师 学界奇人

## ——我所了解的张政烺

孙言诚

20世纪七十年代，蔡美彪先生曾经说过：“社科院有两个学问最渊博的学者，一个是文学所的钱钟书，另一个就是历史所的张政烺。”钱钟书如今是妇孺皆知，他的《管锥编》《谈艺录》被誉为博大精深的学术巨著。张政烺没有巨著，但是，除了外语（1932年考北大，他外语考了24分），在诸多文史领域中，张政烺所取得的成就，与钱先生相比，毫不逊色。即使是在中国语言文学方面，张

政烺的文字学和通俗小说研究，也堪称高深。

抗战胜利后，北大欲聘张政烺任历史系副教授，主持清华文学院的朱自清却愿意聘他正教授，去清华讲文字学。无奈之下，北大只好聘他任正教授。那年他三十四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正教授。编纂《汉语大词典》时，吕叔湘是首席学术顾问，编委会请示哪些人可聘为学术顾问时，吕先生说：“别人我不了解，张政烺是一定要聘的。”

三十年代，傅斯年先生曾称张政烺是小王国维。那时候，张政烺只是北大的—名学生。傅先生是从研究方法（地上地下二重证据法）和思考深度上评价张政烺的。从某种意义上，这可视为对晚辈的欣赏和提携。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佩服傅先生的眼光。张政烺几十年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当年傅先生确实是慧眼识珠。由于殷墟甲骨、中山王铜器、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银雀山汉简、周原甲骨等等大批文物的陆续出土，张政烺过目的古文字材料远非王国维可比，他所取得的成绩自然也比王国维多出许多。经过五六十年的学术积累，张政烺从“小王国维”，变成一位真正可与王国维媲美的古文字大家。

### 学生时代露峥嵘

1932年7月，张政烺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先报考了辅仁和北大，均被录取。7月底，他又报考清华。那年清华的国文试题，是陈寅恪代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出的。题目两道：作文：《梦游清华园记》，对子：“孙行者”。

1956年，陈寅恪在试题识语中说：“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猻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

考生中答“胡适之”的共三人，张政烺是其中之一，另有一人是周祖谟。但后来张政烺认为，“胡”字不合平仄，字义也不对，标准答案应该是“祖冲之”。

张政烺没上清华，原因是同寓的陈君，作文因时间已到没点“梦”字，非常懊丧，下午两人就不去考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报考北大是同乡许维通代办的，报名费三元，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他竟去了北大。

在北大历史系读书四年，两件事让张政烺名动学界。

第一件事是他在《史学论丛》上发表了《平陵陈导立事岁陶考证》。文章是

对一片临淄出土的陶片所作的考证。此前，陶文考证多为考释单字，而此文却在文字考释清楚之后，又致力于印证历史，方法之新颖令人耳目一新。

陶文共九个字：“平陵陈导立事岁𡇗（音 ji，二声）公”。陈导之名，屡见于陶文，而青铜器《子禾子釜》《陈骅壶》的铭文中也曾出现。陈导是谁，从无有人言及。倒是两件青铜器，专家都做过研究。陈簠斋认为，“子禾子”就是太公田和，“再立事岁”则是指田和为齐相当国之时。郭沫若根据《陈骅壶》铭文中有关伐燕记载，断言该壶为齐襄王五年田单败燕师所获之器，所谓“陈导再立事者”“即国复之后重任旧职也。”他认为，两器均有陈导之名，时代必相去不远，“大率皆齐湣王末年之器”“子禾子断非太公和也”。

张政烺用《史记》《战国策》《庄子》《吕氏春秋》等文献记载和出土铜器《子禾子釜》《陈纯壶》《左关之𡇗》等铭文对比，证实“子禾子”确为太公田和。同时他指出，田和只是在立为诸侯之前才称和子，立为诸侯之后则称齐侯，因此，《子禾子釜》《陈骅壶》都是田和未立诸侯前之器。

《子禾子釜》的时代明确了，陈导其人便不难考定。张政烺征引《左传·哀公十四年》杜预注及《史记·齐太公世家》索隐引《系本》之文，考证出陈导乃僖子乞之少子，成子常之幼弟，田惠子得。至于“立事岁”，张政烺不同意陈簠斋和郭沫若的“为相当国”说。他举出若干条金文、陶文中的“立事岁”记载，所出现的人名都不曾“为相”，因而提出“立事岁”应是作大夫之年。“陶文称平陵陈导者，盖为平陵大夫；壶文称陈导者，盖为𡇗（古地名，指该地的大夫，读音待考）大夫。再立事岁，是更为大夫之年，则由平陵移𡇗也。”𡇗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襄子相齐宣公时，“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惠子得是襄子的叔父，“则其为平陵、𡇗大夫，当在此时也。”

由此，张政烺推论：齐国大夫纪立事之岁而不用天子纪元，正反映了春秋末年“禄去公室，政在私门，大夫擅权，陪臣专纵”的历史现实。这片陶文，使人们明明白白地看到了“齐政下逮之迹”。

文章最后，张政烺又考定了“𡇗公”的含义。𡇗是地名，𡇗公即𡇗地的公量，是陈导做平陵大夫时使用的公量。它和陈犹釜、子禾子釜以及陈导主釜等陈氏家量，正相对立。田氏篡齐之前，为收买民心，“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



其粟予民以大斗”。小斗和大斗，即家量和公量。平陵大夫陈得出土之器，有家量也有公量，这又为田氏在篡齐前收买民心的历史，作了真切的实证。

一片小小的陶文，竟考证出如此丰富的历史内涵，令人叹为观止。尤其可贵的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居然推翻了两代古文字大家的成说，而且立论之精确，不容置疑。文章发表之前，张政烺曾将清样寄请郭沫若过目。郭沫若回信说：“大作已过细拜读，子禾子釜、陈骅壶年代之推考确较余说为胜。陈导之为惠子得尤属创获，可贺之至，……尊说确不可易，快慰之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北大史学系的一次座谈会上，郭沫若紧握住张政烺的手说：“早就知道先生的大名，今天才相见，幸会！”两代学者的学术神交，在中国古文字研究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第二件事发生在半年之后。

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在文学史课上对学生们讲：“《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谁，我至今仍不知道。如果哪位同学知道，盼能相告。”张政烺没去听课，他从中文系李光璧同学那里听说了这件事，随即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无名氏《传奇汇考》卷七《顺天时》下云，《封神传》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而以故事演进观之，其时代又失之太早。因疑‘元’乃‘明’字之误。盖即万历间兴化陆西星所作。长庚者，西星之字也。”张政烺征引了嘉庆《扬州府志》和咸丰《兴化县志》，对陆西星的生平、著述作了细致的考证。他特别指出，其所作《南华副墨》“大旨谓南华祖述道德，又即佛事不二法门，盖欲合老释为一家。其思想与《封神演义》之称燃灯、慈航、接引、准提为道人，文殊、普贤、衢留为元始弟子，混释老为一谈，既崇道家而又不废释教者，正合。以是颇疑《演义》即西星所作。”

接到张政烺的信，胡适大喜过望，立即写了回信：

政烺同学：

谢谢你八日的信。

这封信使我很高兴，因为前几天孙子书（按：即孙楷第）把《传奇汇考》的一段抄给我看，我不信“元时道士”之说，故颇不信此段记载。现在得你的考证，此书的作者是陆长庚，大概很可信了。



他的《南华副墨》有万历戊寅自序，戊寅为万历六年（1578年），其时已在吴承恩（生约当1500年）近80岁的时候了，《西游记》必已流行。陆长庚大概从《西游记》得着一种 inspiration，就取坊间流行的《武王伐纣书》，放手改作，写成这部《封神演义》。

.....

胡适二十五、六、十夜

在征得张政烺同意后，胡适把两人的通信发表在《独立评论》上。据说，事后胡适曾对人慨叹：“北大真大啊！”

学生时代，张政烺以扎实的学问，缜密的思考，震动了文史两界。崭露头角已不足形容北大的张政烺同学了。1936年，张政烺大学毕业，傅斯年依据他的“拔尖”思维，把张政烺接收进了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史语所，张政烺阅读了海量的图书，写出不少高水平的论文。史语所十年，张政烺走完了从青年学人到专家学者的艰苦路程。1946年他从李庄回到北京，被聘为北大史学系教授。

### 经得起复案的学问

在张政烺八十寿诞的祝寿会上，一位学者说：“张先生的文章，结实得像砖头。”话音甫落，会场爆发出一阵哄然的笑声。这句话形象地概括了张政烺的学术风格：文章掷地有声，结论坚如磐石。我们不妨从古文字和版本目录研究中各举一例。

甲骨文有一囚字，卜辞常见。学者对此字见仁见智，各有解释。孙诒让释“刑”字，唐兰从之；商承祚释“囚”（囚徒之囚）字，郭沫若、叶玉森、孙海波从之。丁山释“死”字，胡厚宣支持，并集中一批辞例确认，学者多依从。

张政烺认为：释“囚”字很像，但辞义无一例可通。释“死”字，多数辞例能通，但也有不少卜辞讲不通，而且字形上说不过去。最大的问题是，甲骨、金文都有“死”字，和小篆、隶、楷一脉相承，绝无疑义。因此，囚不可能是“死”字。

这个字，《说文》和一切字书里都找不到，怎么办？张政烺认为：可以从一

些古字里发现它的“化石”。他果然找到一个字：

𡩺，仁也，从皿，以食囚也。官溥说。（许慎《说文解字》皿部）

张政烺指出：“许氏分析𡩺字从皿是对的，把上部认作囚，认为是会意字，却十分牵强附会。古人不会为食囚这一动作造一个字。大约汉代学者都已不了解这个字的结构，只有官溥有此一说，许氏便采用了。这个字应当是形声字，从皿，囚声。囚就是甲骨文的囚变来的，不是‘囚’（囚徒之囚）字。”“甲骨文应当是𡩺的声符，囚的读音也就是𡩺。”

《说文》里由𡩺得声的字有十几个，常见于古书的是“殓”和“藟”。张政烺推断，甲文的囚字，应是《说文》的藟，古书上也写作“藟”和“𡩺”，是埋藏的意思。刘向《新序》卷四有：“晋平公过九原而叹曰：‘嗟乎！此地之藟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将谁与归乎？’”这里的“藟”字做埋藏讲，是处理尸体的方法。古人忌讳说死，有“阖棺乃止”（《论语·子贡》），“盖棺事始定”（杜甫诗）的说法。阖棺、盖棺都是处理尸体的方法，用来代替说“死”。因此囚读为藟，可以引申出死的意思。

张政烺又考察了囚字的字形。囚字所从的口是什么？商承祚说：“象囚阑之形而纳入其中”，郭沫若说像“人在棺槨之中”。张政烺认为，口是木槨，也作棺材用。《论语·子罕》：“有美玉于斯，韞槨而藏诸？”是用槨藏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马死了“公将为之槨”，杜预注：“为作棺也。”是用棺藏马。秦《诅楚文》责楚王“拘圉其叔父，寘诸冥室槨棺之中。”是用槨棺藏人。可见槨与棺相似，是一种大柜，可以容马或人。把口解作槨而不说成棺，语义范围符合事实的可能性大些。张政烺还指出，第一期晚期的甲骨有一字，在囚的四周加四个小点，像是埋藏在沙土中的形状，尤显见其掩埋之义。

至此，张政烺从形、音、义三个方面把囚字释清了。然后，他把它引入卜辞验证。他撇开用“死”可以讲通的辞例，专门列出那些用“死”讲不通的。如：

甲辰卜，争，贞，缶其囚。

缶是人名，这个囚字是藟藏人间还是瘞埋地下尚不敢定，但敢断言它不是“死”字。

丙戌卜，争，贞，七白马囚，隹丁取，二月。

这是贞问要埋七匹马，在丁（未）这天选取。

勿步，今日囚豕。

蘊豕是埋牲，这大约是为了祭祀。

贞出疾，羌其囚，十一月。

贞羌亡其囚，十一月。

这是殷王有病，卜埋羌（人）以祈福。这里羌是祭品，囚是埋，亡其囚是不埋。

口亥卜，贞，……囚及不。

这是卜问是否埋俘。

总之，把囚释为蘊，解为埋（古书时用瘞字），结果是一一贯通，无不文从字顺。尤其珍贵的是，他发现一片龟甲上有八条卜辞，是同一天贞问八个人“不囚”（是否埋葬）的。他指出这是有关殉葬的贞问。他说：“《朝鲜李朝实录》曾记载明代初期皇陵要有六十位宫女殉葬，必先开出名单，逐一经过占卜才能决定。这片龟甲或许也是这类办法”。张政烺用扎实的文字学功底，文献和地下材料对勘，以及重视实践检验的方法，把古文字的考释做到了极致。

初进史语所时，张政烺曾被安排管理图书，他自称是取书手。几年的管书、读书、借书、买书，竟把他训练成了一位版本目录专家。他写了一些版本目录的研究文章，最有名的是《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

《沿革例》原是附于相台岳氏所刻《九经三传》之后，和该书一起刊行的。后来《九经三传》传世日少，且多零本，而《沿革例》内容翔实，有益于经学研究，遂单独印行，这才有了各种《沿革例》刻本传世。张政烺列出史语所收藏的五种版本，指出其中《粤雅堂丛书》本，标题后有“宋岳珂撰”。

岳珂是岳飞的孙子。岳飞曾说：“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所以岳珂所著书，姓名前常冠以“相台”二字，“相台岳珂”成了习见的称呼。从明万历重编《内阁书目》以来，公私藏书目录及有关校讎的著述，无不以为相台《九经三传》及《沿革例》出自宋岳珂之手。三百年来，此书为宋版几乎已成定论。

然而，细心的张政烺却发现了破绽。原来相台岳氏的《九经三传》，是仿照《廖氏世綵堂刊正九经》刻印的，其《沿革例》则是廖书《九经总例》的翻版。岳氏自己说，仿刻时“悉循其旧”“非敢所增损于前”，而且说“旧有《总例》，存以为证。”岳氏所做的，只是增刻了《公羊传》《穀梁传》等，所以才将书名

由《九经》改为《九经三传》。

和《沿革例》一样，《九经总例》也曾经单刻，明代的目录书中尚有著录，可惜原本失传，无法睹其原貌。据著录，书的内容是对九经诸本之歧异详加考辨：“曰书本、曰字画、曰注文、曰音释、曰句读、曰脱简、曰考异，凡七。”而《沿革例》的主要部分——《总例》七则，正是廖书《九经总例》的原文。几百年来，人们都把《九经总例》视为佚书，以不能相见而感到遗憾，不料经张政烺考证，此书就在《沿革例》之中。郑樵所谓“书有名亡而实不亡者”，此其例也。

那么，刻印世綰堂九经的廖氏是谁呢？张政烺引用《天禄琳琅书目》的考证和周密《老雅堂杂钞》的记载，证实他是廖莹中。廖刻九经约在度宗咸淳年间，而岳珂生于孝宗淳熙十年，比咸淳早八十余年，他不可能看到廖刻九经。何况仿刻是在九经“元版散落不复存”时才进行的，那就更不可能出自岳珂之手。

仿刻《九经》的相台岳氏，既然不是岳珂，那会是谁呢？张政烺根据卷末牌记“刻梓荆溪家塾”，判断此人应居住在荆溪水边，即江苏宜兴。岳珂故居在江州龙门，从未居住宜兴，因此，刻书人不仅不是岳珂，甚至也不会是岳珂的后人。宜兴确有岳氏家族，其著籍不知始于何代，但附于相台郡望则在元初。张政烺引用大量元代文献、笔记，证实刻《九经三传》的人，原来是岳浚。据同时代人方回的诗，岳浚刻《九经三传》是在元成宗大德年间，上距廖莹中刻《九经》已三十余年。其时宋亡已久，故《九经三传》不避宋讳，而书上著录的刻工亦为元代人。三百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宋版的相台书塾《九经三传》，经张政烺考证竟是元刻，在版本目录学界引发了一场地震。

张政烺文章中还有一段小插曲。他说，四库馆臣明明知道《天禄琳琅书目》的考证正确，刻世綰堂九经的是廖莹中，但为了迁就岳珂刻书，竟将刻《九经》的廖氏说成是廖莹中的祖父廖刚。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乾隆上谕曾定相台书塾是岳珂，馆臣希意承旨，不敢违逆。针对此类马屁学者，张政烺愤然写道：“自来帝王吐词为宪，苟与真理相违，亦鲜有不失败者矣。”张政烺研究版本所得出的结论，今天读来仍觉怵目惊心。

张政烺文章写于1943年，文章一直搁置案头，直到1991年才公开发表。然而，张先生的观点早已蜚声学界。1960年赵万里编《中国版刻图录》时，就采用张先生的意见，并称赞：“张说至确”。其实，张政烺的学术观点“至确”，

早在五十年代就为学界公认了。顾颉刚先生的日记中有这样一篇：

1958年1月12日补记，1957年中秋节丕绳（童书业）云：

现代人所作历史研究文字，大都经不起复案，一复便不是这回事。其经得起复案者，只五人：先生、吕诚之（思勉）、陈寅恪、杨宽、张政烺也。然吕先生有时只凭记忆，因以致误。陈先生集材，大抵只凭主要部分而忽其余，如正史中，只从《志》中搜集制度材料，而忘记《列传》中尚有许多零星材料，先生亦然，不能将细微材料搜罗净尽，以是结论有不正确者。杨宽所作，巨细无遗矣，而结论却下得粗。其无病者，仅张政烺一人而已。”<sup>1</sup>

童先生的学问尽人皆知。这位大师级巨匠在五十年代便把张政烺视为史学研究第一人，位于陈寅恪、顾颉刚之上，虽然有些语出惊人，恐怕也不是于理无据。但就是这样一位经得起复案的学者，却在随后开展的拔白旗运动中首当其冲，被逐出北大，扫地出门，赶到中华书局当副总编辑。

### 破解“奇字”

张政烺所涉学术领域很广，但古文字学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建国后，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大批文物出土，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资料。甲骨、金文、陶文、封泥、战国铜器、秦汉简帛，应有尽有，目不暇接。

1974年，文物出版社接到一项任务，整理出版临沂银雀山竹简、长沙马王堆帛书、定县汉简、阜阳汉简、云梦睡虎地秦简等，准备向国庆25周年献礼。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出版社连忙邀请十几位专家成立整理小组，张政烺与在其中。张先生果然厉害，看着竹简便能粗读，读上几句便能判断出自何典，原典确定，前后简顺序自可排列，其古文字功力，令人心服。整理组的专家公推张政烺为主持人，工作安排、整理中的意见分歧，均由先生定夺。在各种新材料的整理、研究中，我国古文字学的整体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张政烺自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最令学界叹服的是他对一批“奇字”的破解。

早在宋代，湖北孝感出土过六件周初铜器，世称“安州六器”。其中有件中鼎，铭文中有两个奇怪的字，实际上是两组数字，一个是七八六六六六，一个是

<sup>1</sup> 转引自童教英《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八七六六六六。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学者不解。郭沫若认为：“二字殆中之族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带有奇字的甲骨续有发现，唐兰先生搜索出十三个奇字，写了一篇文章：《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失传的中国古代文字》。文章提出，这些奇字是在甲骨金文之外另一体系的文字，他们是用数目当作字母组成的，目前这种文字已经消亡。他在考古所做学术报告时说：“这是一种已经失传的少数民族文字。”有人问他，少数民族干嘛用数字作文字？他也说不清，还笑着说：“那不成了电报了吗？”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周原甲骨出土，又出现了奇字。学者议论纷纷，奇字成了弥漫在古文字学界的一个谜。1978年冬，吉林大学主持召开了中国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几乎囊括了当时全部的古文字专家、学者。会上，徐锡台先生做周原出土甲骨文字报告，最后一节便是“奇字问题”。他说，有奇字的卜甲约七八片，还有个铜甗上也有，他不认识，请与会专家帮他释读。大家兴趣极浓，一时间会上会下争说奇字。休息时，不少人去请教张政烺。

第二天，大会为张政烺安排了一次临时发言，题目是《古代筮法和文王演周易》。先生指出，所谓奇字原来是筮数，是古代用数字表示的易卦。金文中三个数的字是《周易》中用三支爻表示的单卦（八卦）。卜辞中六个数的字是《周易》中用六支爻表示的重卦（六十四卦）。《周易》卦画用阴阳爻，而金文、卜辞中的易卦则用奇偶数。他当场把周原卜甲上的四组数字，依奇偶数换算成阴阳爻，在黑板上写出蒙（坎下艮上）、蛊（巽下艮上）、艮（艮下艮上）、既济（离下坎上）四卦。几百年来蒙在这一串串数字上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了。

会议主办者张忠培先生这样描述当时的现场：

他（张政烺）讲得很流畅，有理有据，条理清晰，语言平缓，听他讲话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他越讲，会场愈益平静，静到掉落一枚针也能听出声音来。他讲完后，会场平静片刻，忽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这次会议最热烈、最持久的掌声。接着，张颌等先生发言，支持张先生的认识，认为张先生是做大学问的。张政烺先生的这个学术报告，是这次古文字学会最大、也是最灿烂的亮点，是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sup>2</sup>

<sup>2</sup> 张世林主编：《想念张政烺》第103、104页，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15。

然而，张政烺并不满意自己的发言，事后他说：“客中手头无书，无法准备，恐怕记忆不真，言多有失，只简单谈了几点意见。”参加会议的邹衡先生回忆：“那天晚上，张先生到我房间来要火柴。我很奇怪，先生不抽烟，要火柴干什么？第二天听了发言才知道，他是用火柴杆排八卦。”如此重大的学术课题，竟然只能用火柴杆准备，可见不是大家要求，张先生原不打算发言。他一生都是这样，很多问题深思熟虑好多年，迟迟不肯拿出来。

会议之后，张先生系统地整理了古文字中数字卦的资料，一开始列出三十几个，后来增加到一百多个，先后写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帛书〈六十四卦〉跋》《易辨》等文章，全面探讨了商周时代的筮卦。美国学者吉德炜看了文章后给张政烺写信说：“从1969年写博士论文起，我就对这些数字符号大伤脑筋，而您却把它讲了个水落石出<sup>3</sup>。”

张政烺曾经说过，年轻时他不喜欢《周易》，不相信占筮和术数。作为五四新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崇尚的是德赛二先生。但是，七十年代参与整理马王堆帛书《周易》，迫使他研究《周易》，了解筮数，不料却意外地破解了奇字。看起来像是歪打正着，实际上是先生深厚文献功底在《周易》上的爆发。

古往今来研究《周易》者代不乏人，但用古文字资料研究，张政烺是第一位。典籍记载伏羲始作八卦、文王重卦，而古文字资料却显示，八卦早在新石器时代便有，重卦则商代确已存在，易学可谓源远流长。张先生的研究，对易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史，无疑是重大突破。近年来，随着王家台秦简和上博楚简等新材料的发现，《易》卦研究日益深入。正如张先生在文章中说的：“希望将来有更多新的材料发现，增加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和探讨的途径。”

然而，不管将来的研究怎样发展，张先生的筮路蓝缕，功不可没。李零先生说：“数字卦是张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学术观点，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很大，将来是要写进学术史的。”

### 真诚求实

张政烺曾经用篆书写过一幅座右铭：“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这是他宗奉的信条，离世后，孩子把它刻在先生的墓碑上。

<sup>3</sup> 《揖芬集》第25、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张政烺研究历史，追求的就是真实。他说：“古代的史学家为了史的真实，认真不苟，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指的是秉笔直书的董狐和崔杼之难的大史、南史。其实，即使是皇帝的奴才写史，先生指出，也要求写得真实。“自汉至清代皇帝都有起居住，照例皇帝本人是不能看的（明代宫廷又有一种宫内起居住，由太监执笔，皇帝也不能看）。”<sup>4</sup>不给皇帝看，就是为了让写史的人能按真实的面貌写。董狐、大史南史也好，太监、奴才也好，写真实的历史不是为人民，是为后代皇帝能吸取经验教训。可见，统治者也须要看真实历史，《资治通鉴》就是例子。只有那些昏君，才喜欢看胡乱吹捧的谎言，像袁世凯专看他儿子为他一个人办的《顺天日报》。

张政烺看不上为政治服务而写的历史。他说：“翦伯赞的许多文章和书是战斗性的，立场鲜明。可惜限于条件，史料错误许多，无法修正，只好原样印出来。读者应当理解著作的时间和目的，理解这样的战斗精神，如果把它当历史课本，学习基础知识，那就错了<sup>5</sup>。”

话说得委婉，意见却很清楚。张政烺认为，研究历史必须重视史料，重视考据的功夫。写真实的历史，要掌握大量可靠的史料，而史料是否可靠，须下功夫考据。有人说，是清代的文字狱才迫使学者走上考据一途，他不同意，他认为那是梁启超等人为变法维新所作的宣传。中国历史学者从事史料的收集和考据工作，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张政烺对史料的考证极其严刻。一件青铜器，一段铭文，都须辨明真伪。1956年8月，故宫博物院召开青铜器鉴定会，与会的都是大学者，有徐森玉、王献唐、于省吾、容庚、商承祚、陈梦家等，唐兰和罗福颐主持。中青年学者，仅张政烺一人。另有一些古董行转来的技工，坐在后排，算是列席代表。会上搬来一件商代铜器——四祀邲其卣。商代铜器多无铭文，有长篇铭文的就更少，可是有三件邲其卣不仅有长篇铭文，铭文中还记有王年，在学术界和古董行名声很大。这件四祀邲其卣是当年张效彬卖了一处房产买下的，几十年来他一直视为珍宝。鉴定会上几乎众口一词是真品，只有张政烺不以为然。他认为卣的形制与商代卣不同，而长篇铭文更像是铸了一片伪铭贴上去的。古董行的人冷嘲热讽，一位学者更是厉声呵斥：“张政烺，你还得再读几年书！”张政烺说：“我再读几年书，它也

<sup>4</sup> 《张政烺文史论集》第771、772、84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sup>5</sup> 《张政烺文史论集》第771、772、84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真不了！”

张政烺当场用酒精、棉花擦去铜锈，露出作伪的痕迹，事后又撰文揭示铭文的伪劣。据高明先生讲，有位老技工说：“我看这件器物眼熟，很像是我师叔做的。”<sup>6</sup>他师叔手艺高，常做伪器。张政烺不是收藏家，但他为考证史料真伪而对古器物所作的判断，常为业界信服。史树青先生在祝寿会上，就声称张政烺是他的老师。

张政烺的考据功夫，并不停留在一器一铭的辨析上，而是通过关键字词、铭文、卜辞的考证，弄清历史的真实面貌。他说：“深挖甲骨文、金文及其它形式的出土文献隐含的真实史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发明，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成为我所研究上古史始终遵循的一条原则<sup>7</sup>。”

他先后用三十年的时间不断地考释、研究甲骨文的“众”字，探讨了商代生产者的基本经济、政治地位。

他用卜辞中的肖田（除草）、尊田（作田垄）、土田（度量土地）、哀田（开荒）、藉（用耒种田）、协田（通力合作），理清了商代农业生产的全过程。

他写《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探讨了商周时期生产者的社会组织。他用兵器铭文和汉砖文字研究秦汉时代刑徒的奴隶劳动，以及冶铁业中的主要劳动力——铁官徒。他考释甲骨文囚字，揭示古代帝王用活人殉葬的史实，并结合文献向学生讲述具体场景。1957年发掘定陵，许大龄先生带北大学生参观，谈及殉葬制度，他说：“我对这问题没研究，据张政烺先生说，朝鲜著作中有明早期使臣的记载，亲眼看见殉葬的宫女赐死前哀泣的情景。”<sup>8</sup>萧良琮回忆参观故宫，“进入西路某殿，有一横梁，张先生说，明代皇帝死后，嫔妃们要殉葬，在这座殿内，由即将即位的太子，向每位殉葬者作一个揖，她们就被缢死在这根梁上。听张先生这么一说，身处该殿，顿觉阴风习习……”<sup>9</sup>

张政烺强调“历史学要讲具体事实”，反对空对空。“我们四十年来以社会发展史作为历史学的中心，发生很多矛盾无法解决。如果把中国的史实考察清楚，展开分析，既可以减少矛盾，也可以充实社会发展史和丰富史学理论<sup>10</sup>。”想想

<sup>6</sup> 张永山主编：《张政烺先生学行录》第20、14、3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sup>7</sup> 《张政烺文史论集》第771、772、848页。

<sup>8</sup> 张永山主编《张政烺先生学行录》第20、14、32页。

<sup>9</sup> 同上。

<sup>10</sup> 《张政烺文史论集》第771、772、848、772页。

耗时耗力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张先生的话振聋发聩。

学术研究“真诚求实”固然不易，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始终以不加掩饰的真实面目出现，那就更难了。然而，张政烺做到了。他是正教授，课堂上却经常窘态毕露。张守常先生这样回忆张先生的第一堂课：“他把书包放在讲桌上，半晌没说出话来。拿一根粉笔转过身去，想在黑板上写点什么，半晌又没写出字来。回过身来面向学生，又是半晌，终于艰难地说出一句话：“兄弟不会教书。”<sup>11</sup>

“兄弟”是他的口头语，有时自称，有时也称学生。在课堂上忘了某字的写法，他会说：“兄弟，这个字怎么写呀？”全然忘记他是教文字学的。找不到板擦，他会用衣袖去擦黑板，弄得满身粉尘，他穿的可是毛呢料中山装。去书店买书，他长时间蹲在地上，翻阅旧书。遇到熟人，猛地站起来，灰头土脸，把人吓一大跳，谁也想不到这竟是张大教授。

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在政治风浪中的安之若素。五十年代，由于学术观点不肯“政治正确”，陈伯达扬言，“绝不能让张政烺在北大散播其言论”。在北京史学会上，有人说：“像张政烺这样的人，就是不准他教书。”1958年教育革命，张政烺第一个遭到批判。翦伯赞说：“在史学革命后，北大历史系对资产阶级教授几乎都要当做废品来处理，首先被处理的是张政烺。”<sup>12</sup>

当时时兴送大字报，面对送大字报的学生，张政烺笑容可掬，说：“我要是不能教书了，就刻印章去，不能刻印章，就去照像”。文革中，历史所的人下放河南息县劳动，张政烺负责养猪。他特地寄明信片给胡厚宣的夫人，托她从北京买药，不是为人，是为猪。后来他又烧茶炉，本来只是烧水，他却天天伏在沉重的水车上为公用水池车水。那时他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

政治运动的频频光顾，使张政烺谨言慎行，从不评论时政，臧否人物。但无论形势多么险恶，他始终恪守做人的底线，不说假话。1956年批胡适，他上台揭发，揭发什么呢？揭发胡适讲宋代话本不知道《一枝花话》。文革初期，姚文元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孙达人批翦伯赞的让步政策，报章杂志铺天盖地，张政烺在讨论会上却说：“让步政策就是有，是客观存在嘛！孙达人的观点不符合事实。”历史所批斗尹达，他说：“尹达的确是走资派，他走的就是我们这些资

<sup>11</sup> 《揖芬集》第25、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sup>12</sup> 翦伯赞：《我和尹达的关系》，历史所油印本，陈智超藏。



产阶级。”八十年代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社科院召开座谈会，张政烺在会上发言：“刘宾雁的书我读过，写得不错嘛！”以至新闻见报时，张政烺的名字被悄悄从与会者中拿掉。

对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张政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他也有普通人的爱恨情仇，而且常常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陈寅恪、唐兰是他老师，陈离开北京时，他亲自送到机场，为此曾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遭受批判。多年来见到唐兰，他总是恭敬地侧立身旁。他的同学傅洛焕（傅斯年的侄子），文革中自杀身亡。标点二十四史时，张政烺自愿承担傅洛焕未完成的《金史》。金史之难，人所共知，仅人名、地名就够人头痛。张政烺是治上古史的，却为了同学点校《金史》。文革后，北大副校长郝斌带一研究生去拜见导师张政烺，谈及一位张先生喜欢的学生文革中遭迫害致死，张先生立时呜咽泣下，双目落泪，极为悲怆动情，弄得那研究生手足失措，极为尴尬。

一位学者，也是老北大学生，这样描述张政烺：“感觉先生远离时局，是一位埋头书堆、认真走着白专道路的大学者，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为学，务实求真的大儒。1989年我看到张政烺先生，使我动摇了我对他的这一认识。他不仅是学问上的一位巨人，更是关心国家大事、认真做人的巨人。”他这“才明白先生将‘为人’置于为学‘之前’，看到了先生一生为人的追求。”<sup>13</sup>

## 【评论】

# 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

方延曦

如何评价毛泽东？对于中国以及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个真正关系到方向与未来的重大问题。遗憾的是，这是一个不允许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当局千方百计回避并有意掩盖的问题。当局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正是这个问题也关系到对执政党执政半个多世纪的基本评价，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前途的问题。

如何评价毛泽东？这真是一个太大的题目，也是一个太难的题目。

说它太大，是因为毛泽东对中国当代历史以及世界历史的作用与影响太大了，即便从1919年毛开始政治活动算起，距今也近一个世纪了。说它太难，是

<sup>13</sup> 张世林主编：《想念张政烺》第103、104页，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15。

因为评价历史人物所赖以遵循的客观标准实在很难统一。但无论这个问题有多大多难，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公民，都没有理由逃避。

就让我们试着来做这件本是历史学家该做的事吧。

要问毛泽东如何评价，首先要问历史人物应该如何评价？

按照我们从小学习的理论，对一个历史人物肯定还是否定，应该是看其对于历史的进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推动历史前进，还是阻碍历史前进。这也正是毛本人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如果我们就拿这种历史观来衡量毛泽东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官方在毛刚死时对毛也做过评价。按邓小平的版本，对毛应该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按陈云的版本，对毛应分阶段评价，即立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

陈的版本是内部传出来的，未见红头文件；邓的版本是党内外公开的，企图一锤定音。也许两种说法各有道理，肯定没道理的一点是，从来没有征求过中国老百姓的意见。

评价毛泽东，从何入手呢？

首先要做的功课是大致梳理一下毛一生的政治活动轨迹，不可遗漏其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相关的毛的重要著作。

我们也将其分成三个阶段来做。三个阶段依次为：革命时期，建国时期，文革时期。

革命时期，从1921年中共建党至1949年中共建政，前后28年。

建国时期，从1949年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后17年。

文革时期，从1966年至1976年毛病故，“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前后10年。

革命时期，从1921年中共建党至1949年中共建政。

20年代中期，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其中名声最大的当属毛泽东，他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满腔热情地歌颂农民运动“好的很”，而且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为农运中的过火行为辩护。此时毛的身份是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合作破裂。中共“八·七”会议决定发动土地革命并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毛奉命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起义失败，毛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的朱德会师，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时，毛的身份是红军一方面军的政治委员，人称“毛委员”。

30年代初期，毛指挥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由于毛实行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成功粉碎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前四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赶上上海中共中央被国民党破坏而转入苏区，毛泽东被排挤，导致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退出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即后世所称的“长征”。

1935年1月在长征路上，中共于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严厉批评中央的路线为“左倾机会主义”，周恩来以中革军委主席身份带头检讨，承认毛的路线正确，从此确立了毛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此时，毛的身份是中革军委主席，后来毛被中国老百姓几十年不变地称为“毛主席”即是从此而起始，但党的总书记——即最高领导并不是毛，至少在中共七大之前，这一点是必须要澄清的。

自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迷信“国联”主持公道，同时加紧对共产党的围剿。

1936年12月12日，流亡关内的张学良东北军于西安剿共前线调转枪口，联合杨虎城西北军对蒋介石发动兵谏，逼蒋抗日。消息传到延安，十年内战血海深仇，一时群情激愤纷纷主张杀蒋，毛也在其中。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发来指示，要求放蒋，拥戴蒋为抗日领袖，同时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被迫妥协。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在北平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国难当头，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红军被改编成三个师开赴抗日前线。毛发表《论持久战》，批评“投降论”与“速胜论”，指明抗日前途。

抗战同时，国共两党并没有停止摩擦，双方都想保存实力，借日寇之力铲除异己。抗战中中共执行毛“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的政策，队伍迅速壮大。

毛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

1945年抗战胜利。国共两党争夺天下，中共取得胜利。

国民党首先是军事上的溃败。这方面，后来大多成了共产党阶下囚的国民党的将军们写了不少回忆录，其中不乏大骂蒋介石瞎指挥的内容。但其实，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固然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因素，但真正要命的还是政治上独裁专制引发的人心转向。

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急剧腐败，大搞“劫收”，“五子登科”，搞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在广大农村共产党提出土地改革，把中国几亿农民一下子抓住。在国统区又发动学生运动，反饥饿，要民主。

得道者得天下，失道者失天下。看看国民党在短短3年内土崩瓦解的过程，最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翻翻毛选第四卷，你确实能感受到革命凯歌行进的强烈气息。正如毛泽东所言，革命形势发展之快，没有人能料到。原来估计全国解放需要3年，现在看用不了。

国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胜利，这是1949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最大的历史事件。毛泽东因此在全国政协会议的讲话中慷慨激昂地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建国时期，从1949年至1966年文革爆发。

1949年以后，中共进入了建国时期，然而号称“从此当家作主”的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吗？

这需要用一些标准来衡量。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应该是看宪法赋予了人民哪些应该拥有的权力？以及这些纸上书写的权力人民是否真正的享有？

人民应该拥有各种自由，诸如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其中最重要的是言论的自由。毛与中共恰恰是在言论这最为关键的一点上绝对不给人民以自由。

我们还注意到了，宪法中没有“罢工”的自由。一个号称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工人却没有罢工的自由，这真是天下最大的笑话。但是我们笑得出来吗？身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在这个国家中生活了几十年，据说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可是……

某一年的宪法中还删去了“迁徙自由”，作为自己国家的主人，他不能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迁徙。不要惊诧，这是事实。1958年的大跃进导致了1960年之后的三年大饥荒，种粮的农民没饭吃，纷纷进城找活路，当局称这些人为“盲流”，用闷罐子车把这些人遣送回乡，也就是说，连讨饭的自由都没有！

有人说“谁说没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文革中人人都可以贴大字报，组织战斗队。”

文革中所谓“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一个颇具欺骗性的东西，有必要多说几句，以澄清混乱。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发明权及命名权其实正属于毛泽东本人。1957年春天，毛在党内发动“整风运动”，他主动号召党内外人士采用“四大”方式“帮助”党整风。经毛及党内高层领导态度诚恳地反复动员，希望党内外人士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给党提意见，保证实行“三不”政策，即“不揪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人们终于开口说话了，因为连毛本人都亲自出面亲口信誓旦旦地做了保证，再不说话，那你还能算是中共的朋友吗？未免太不识相了罢。

然而这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靠不住，“四大”了还不到两个月，毛就受不了了。毛讲过一个“叶公好龙”的典故，讽刺那种口头上说喜欢龙，其实内心里害怕龙的人，而毛正是这样的人。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亲自撰写的评论员文章《这是为什么》，打响了“反右”的攻击令。从此，形式急转直下，全国到处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人们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形容那些反复无常，不讲信义的人，毛正是这样的人。

全国到底抓了多少个右派，没有正式统计，据说有55万之多。除了各地各级文化教育单位揪出的中小右派之外，全国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也大多从“座上宾”变成“阶下囚”，如民盟……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等。针对一些人自然会产生委屈与不平，毛竟然能理直气壮地回答道：“有人说这是阴谋，不对，我们说这是阳谋。”若同那个父亲将被烹而竟能说出“请分我一杯羹”的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比一比不要脸的流氓气，毛的水准绝不在其之下。

1949年之后，毛泽东进了中南海坐了龙廷，生性好斗、自称“无法无天”的毛开始发动一系列“与人奋斗”的政治运动。简单罗列如下：



1950年派江青出头组织批电影《武训传》，批电影《清宫秘史》。

1955年亲自写按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

1955年批党内周恩来、陈云等的“右倾”。

1957年反右派。

1958年大跃进。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1960年—1962年三年大饥荒全国饿死3000万人。

1962年7000人大会上被迫向全党道歉退居二线。

1962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1965年发动农村“四清”运动。

文革时期，从1966年至1976年毛病故，“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

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启用林彪，打倒刘少奇。

1971年“9.13事件”发生，林彪叛逃，钦定接班人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1974年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企图打到周恩来未逞。

1976年9月9日毛病故。

1976年10月6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捕，文革落幕。

毋须详述，凡亲身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对那些惨痛往事皆有切身体会。

毛在位27年，整整折腾了27年，把好端端一个中国，折腾得民不聊生，一塌糊涂。中国有句古语，所谓“庆父不死，鲁难不已”，这话用在毛身上简直是太恰当不过了。

我们简单回顾了毛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为什么要这样做？为的是让人们在头脑中有一个基本的轮廓，可以作为我们分析其功过的背景。

总括起来说，成也肖何，败也肖何。1949年以前，如果没有毛，没有毛在战场上的足智多谋，共产党夺不到天下，因此，可以说毛是共产党的最大功臣；但是1949年后，如果没有毛，没有毛的种种倒行逆施，共产党也不会那么快就失去人心，因此，可以说，毛又是人民的大罪人。至于中共的天下最后能不能保得住，那就要看共产党的运数了。

说实话，毛这个人的运气真的是超好，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命太硬。戎马倥偬几十年，竟然没受过一点伤：被民团抓到过一次，略施小计就得以脱身。倒

霉过几次，都是因党内斗争受排挤，可也没伤筋动骨。明明是他捅的漏子，黑锅得别人来背。例如湖南农运，搞得那么过火，直接逼出了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但真正倒霉的是陈独秀。长征路上，几个人串连密谋，又把毛抬了出来，因为电台丢了，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反倒帮助毛在党内夺了权。国共相争，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毛又把抗日大旗举了起来，以抗日为号召以赢得民心，从此，延安成了抗日灯塔，其实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执行的是毛的“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的策略，坐山观虎斗，希望日蒋两败俱伤，最后坐收渔人之利。西安事变更是救命稻草，终使共产党得以在陕北偏安一隅。抗战胜利，俄国老毛子又给了林彪的四野大量的武器装备，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打下了基础。

为什么在短短的22年中就能能把天下夺到手？对此问题，众说纷纭。其实毛本人早就提供了答案。

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毛最为看重的是所谓“两杆子”，即枪杆子与笔杆子。

首先是枪杆子。关键在于军事上的胜利，而军事上的胜利又离不开一个至为简单的策略，这个策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为什么说这个道理极其简单？打个比方：二人相斗，一个对一个我打不过你，那我就两个对你一个行不行？如果还不行，那我就三个对你一个行不行？总之，我始终坚持一条原则：以多打少，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以打赢为目标。这样，也许就全局来看，敌强我弱，但在每一个局部，总是敌弱我强。延以时日，积小胜为大胜，终有一天形势将会逆转。道理是非常简单，可惜当时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就是不懂，因此毛就是比这些人高明。

我们还要看到，军事上的较量不仅仅在战场，还有另外两手居于辅助地位，也很重要。哪两手呢？一是“用间”，即派出秘密特工，潜伏到敌人的心脏里，敌方的一举一动，我方了如指掌，真正做到了兵法上所谓的“知己知彼”。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对此，许多为中共歌功颂德的文章写到了如此地步：敌人的作战计划蒋介石还没看到，已经送到了毛的桌子上。还有一种情况，两军对垒之际，突然内部有人倒戈，整师整军地投向敌方，想想看，这该有多么恐怖！这样的仗怎么打？

除了“用间”这一手，第二手就是“造舆论”，也就是发挥“笔杆子”的作用。毛对“笔杆子”的重视绝不亚于对枪杆子的重视。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比起共产党真的是差得太远了。当然，从根本上说是国民党的腐败给了对手揭露抨击的可能，但在舆论上抢占道义的制高点，最大限度地争取民心，真的是共产党的杰作，不仅农民、工人，连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都被争取过去，形成了反蒋的统一战线。

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毛对枪杆子和笔杆子的重视丝毫没有松懈，但是因为目标对准了人民，这一点就决定了他必然达不到他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最初，广大善良的人民对于“大救星”感恩戴德，但没过几年，惨痛的现实就教育了人民：肃反、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把人民一次次抛入痛苦的深渊，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和平年代里几千万人死于非命。

我实在想不明白，面对如此血淋淋的历史事实，为什么还会有人煞费苦心地去为毛辩护？如果是因为他们年轻没有亲身经历，那就是出于无知；如果他们了解真相还那样做，那就是没有心肝。还有些人是连基本的事实都不承认，这显然是笔杆子的功劳、愚民政策的结果，但是没有关系，历史的真相是不可能被永远掩盖的，正如民间俗语所言：“千年的字纸会说话。”

毛泽东这个人，若从个人秉赋与才能论，绝对可以称得上出类拔萃，你看那文章、讲演、诗词、书法，几乎样样皆精，真个称得上随心所欲，气势磅礴，如果再加上谋略，特别是用兵打仗，能文能武，无论是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还是大老粗出身的红军将领，都不能不服气，这样的人在中共党内无人能出其右：即便在整个中国，几乎也找不到第二人能与之比肩。这就是毛能以一个中国偏僻小乡村里走出来的小知识分子的身份最终坐上中共一把手宝座的主要原因。

但是评价一个人、特别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仅仅着眼于他的才能是远远不够的。毛的问题主要在于他从历代帝王那里学习与继承下来的“帝王思想”与“驭人术”，使他的个人品德遭到了严重污染与扭曲。

这样说有根据吗？毛不是口口声声讲的都是“为人民服务”吗？不错，但那仅仅是口头上的，实际上在毛的心目中，人民如草芥，连蚂蚁都不如。这里只须举出一例便足以证明。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1957年毛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毛说：“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我们不应该害怕原子弹和导弹，不管爆发什么样的战争——常规战争还是热核战争——我们都将取得胜利。至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也许会损失3亿多人。那又怎么样呢？打仗嘛！”听闻此言者无不毛骨悚然，全场死沉沉一片寂静。

如果说毛在这里只是“假设”，那面对和平年代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的事实毛是什么态度呢？刘少奇对毛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你我是上书的。”这话至少证明刘对历史还是有所敬畏的，而毛却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请看，毛的这种态度恐怕连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专制帝王都要自叹不如了吧？

对人民的真实态度是这样，对战友的态度又如何呢？看看毛曾经的亲密战友的下场就清楚了。

高岗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毛曾口口声声感谢陕北救了中央，建国后毛先是怂恿高出头反刘少奇、周恩来，但在权衡了形势与双方力量对比后毛又出卖了高岗，最终高岗因绝望自杀而死。

刘少奇是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紧跟毛不遗余力，在帮助毛建立个人崇拜上出力最大，结果怎样呢？在文化革命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惨遭非人折磨而死。

林彪作为毛的心腹爱将，1962年不顾病体亲自出席“七千人大会”为毛开脱大跃进饿死人的罪责，1966年又为毛发动文革保驾护航，结果在1971年的“913事件”中被迫逃亡国外而丧生于外蒙古的大漠之中。

其他如彭德怀、贺龙等被以种种手段迫害至死的老战友就无计其数了。难怪曾长期以“朱毛”并称的朱德老人在目睹了那么多中共党内高层自相残杀的悲剧后无比痛切地说：有谁还会相信我们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

当然，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毛亲自下令致死的，毛不会这样做，他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双手直接沾上鲜血。

对此，费正清这样评论道：“斯大林是从内部来清洗联共党的，是利用党的机器秘密进行的，而毛对中共是从外部清洗的，是利用红卫兵之类的群众组织公开进行的。斯大林用他的秘密警察杀害了几百万人，毛则依靠解放军，并采用公开使人屈辱的方法。”

同样是杀人，两者有什么不同呢？后者比前者更虚伪、更阴险，对社会、对人心的伤害更深剧、更难治愈。经济上的破坏恢复起来相对容易，但整个社会道德的沦丧要想恢复恐怕一百年都不够！诚信，本应是做人的基本品质，然而，诚信在当下的中国几乎已是荡然无存，是毛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最大的罪恶。

从毛对于人民、对于战友的真实态度中，人们看到的是无法无天，无情无义。至于毛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人所共知，就不必说了。

曾经有一阵毛的卫士、医生、护士、厨师、舞伴……等身边人纷纷出来讲话、著书，以种种所谓亲历的生活细节驳斥某医生对毛私生活的“污蔑”，力陈毛如何平易近人、俭朴节约、一心为民，形象高大光辉。许多人不去看血淋淋的事实，却天真地以为，连这些人都出来亲口作证了，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我的回答是：不能。从法律意义上说，恰恰是这些人没有资格出来作证，作为亲人与近侍，他们应该回避。而且如果这个逻辑能够成立的话，我们可以拿出许多有关希特勒的回忆录，其中不乏其亲人或近臣对他的推崇与赞美，但那是对其真正客观公正的评价吗？

赫鲁晓夫有一句评价毛的话：“毛自认为是上帝派来执行上帝命令的人，毛还可能认为上帝是在执行毛自己的命令。他永远不会有错。”这句话听上去似乎有点刻薄，其实非常准确。

毛这个人精力充沛，意志顽强，霸气干云，自视极高，凡是他认定的目标，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哪怕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也必须实现。这样强悍的性格固然可以做成很多看似做不成的事情，但如果目标错了或实现目标的条件不成熟，也必然酿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大跃进、文化革命都是最有力的例证。

毛身上这种个性特质，被许多人看成是“人格魅力”而大加称道。其实，这样的“人格魅力”在希特勒、斯大林身上都存在，推崇这些杀人魔王的“人格魅力”或是他的同类，或是受虐狂——即所谓“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文革的最大教训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手造了一个神，造了一个“句句是真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神，崇拜他，迷信他，让这个神主宰自己的全部甚至生死，想想看，这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鼓吹的东西有什么两样？



令人感到恐怖的是，还有那么多人在美化毛的同时竭力美化那个时代，谁要敢于对那个时代发出一点微辞，他们就准备和谁拼命。这与文革中的红卫兵、与希特勒的冲锋队又有什么区别！

我们知道，缅怀那个时代的许多人其实是出于对当下贪腐横行、贫富悬殊的痛恨与义愤，这种痛恨与义愤是完全正当的，当政者必须正视与着力解决那些问题，而民心正是可以利用依靠的力量。病症在那里明摆着，无论左中右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病因的诊断是否正确，诊断对了，病患可能治愈或减轻；诊断错了，病患可能加重甚至送命。对于社会病症，其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把毛时代美化成“王道乐土”或“世外桃源”，那就大错特错了。必须指出，正是毛时代的专制与愚民，对权力的放纵，对权力的没有制约，造成了今天的恶果。开药方治病本来是应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才对，有人却要逆潮流，开倒车，那是南辕北辙，饮鸩止渴呀！

那些处心积虑为毛辩护的人，那些听到有谁胆敢非议毛就骂街甚至恨不得动粗的人，说他们愚昧实不为过。我分析这些人有两类，一类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睁眼说瞎话，那显然是某种利益使然。而另一类出发点可能很真诚，这些人，要么是确实不明真相的糊涂人，要么是奴性深入骨髓的奴才。不管哪一种，在真相已经掩盖不住，面对越来越多被打捞上来的真相可就是闭眼不看，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种人生来就是“你不打我不舒服”的“贱骨头”，无可救药了！

还有一种人，他已经不能否认事实了，但他总是强调动机，即事虽然没办好，但心还是好的。我不怀疑这些人用心忠厚，但他们是否知道毛对于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曾经有过一番宏论吗？毛是这样说的：“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如果我们也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毛自己，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问题的全部要害在哪里呢？在于毛用武力夺得了中国的政权。在丛林法则盛行的社会，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这是林彪一语道破的。用马克思那更富于哲学意味的话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作为掌握最高统治权的毛，他可以垄断一切，支配一切，甚至毁灭一切，这一切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部领域，包括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肉体生命及灵魂。从此，毛说什么就是什么，一言九鼎，没有人能反对，也没有人敢反对，毛成了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神。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主意识淡薄，民主制度尚未确立的国度里，大多数民众信奉强者为王天经地义，他们痛恨贪官与奸臣，祈望明君与清官来拯救他们。民众的被利用与他们自身的弱点有直接关系：看看当年老佛爷与义和团拳民的关系，看看文革中“红太阳”与红卫兵的关系，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

梁漱溟先生临终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不能说梁老先生太悲观，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确实很不完美，放眼全球，净土难寻。如果用理想主义的态度要求，也许连一天都过不下去。命中注定，从不完美到相对完美——没有最完美只有更完美——是一个渐进的漫长过程，中间必定还会有曲折与反复。

可惜的是，人生而有涯，最长不过百年，既然不能长生不老，那就得快点儿干，“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抱负太强，或野心太大，犯急性病的错误就是难免的了。揭竿而起闹革命自然因为有活不下去的理由，但也不能全然否认英雄造时势替天行道的情结动因。那些自命为绝代英雄的人，迷信自己具有超人的伟力，改天换地，更新人性，天降大任，舍我其谁？说狂妄自负都嫌轻了，“唯意志论”是他们的标配。但是古往今来，有多少信奉“朕即国家”的独夫民贼，不论其如何不可世显赫一时，却没有一个能逃过这个规律，最终都免不了灰飞烟灭，其赫赫功业也随风消逝，更糟的是还可能留下千古骂名，为世人永远唾弃。

有人反对否定毛的人格，那就请他们听听尚德塞先生的质问：

“宁可负天下人，不可为天下人所负，只有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性极端，才会那样毫无人性翻脸背叛最亲密的同志战友朋友，出卖糟蹋颠覆为他成名立业的整个共产党组织，同样毫无廉耻结交最凶恶的敌人对手恶棍，唯此才可以毫无人性顾忌一意孤行成名立业做到极端，发动文革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唯老婆子侄亲信之家天下可信赖，走马灯般更换权力班底换人如换马朝坐殿堂夕沦阶下，玩弄权势

胜过宗法专制的王朝帝皇，这样的思想言行还有一点所谓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先进性，不是连起码的严肃性都没有如同政治儿戏吗？这还不能说老毛存在人格问题严重人格问题吗？”

“从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四清直到文革，唯我独尊唯我独断专行好大喜功文过饰非忌谏爱谗贪栈权位阴谋玩术误国伤民，等等，他都有过充分表现，文革更是堂堂大中华中共世界第一大党唯有老毛一个完全彻底革命派，这样极端严重的自恋自大大自狂难道还不是人格问题吗？和这样的人共事在他领导下生活工作，有谁能言行如意免于恐惧心平气和从容相处？权贵如周恩来都要大管家式的小心侍奉，亲密如江青者已经做到政治夫妻荣辱与共还要看老毛脸子随他喜怒哀乐而为，这样的人格连普通人性人情都没得比，还能说不是人格问题吗？他统治下的中国，偌大国家所有个人和群体，都毫无例外必须以他最高领袖思想意志为言行准则，这样的专横霸道难道还能说是没有问题吗？”

有人以“开国领袖”名义反对否定毛，那就请他们听听段协平先生的质问：

“如果一个‘开国领袖’领导下的国家，能造出原子弹，却不能保证它的人民吃饱肚子，如果一个国家能为第三世界大把地撒银子，却让自己的人民‘人相食’，这样的伟大成就’到底是谁的成就？如果‘开国领袖’整天只是醉心于‘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兴无灭资’‘破四旧立四新’，整天搞运动，窝里斗，让所有人特别是地富反坏右等贱民都生活在恐惧中；如果‘开国领袖’就知道用户口、票证把国人束缚在土地上、单位里而动弹不得，从而失去迁徙的自由，从而‘龙生龙、凤生凤’只能是农民阶层结构板结化；如果‘开国领袖’既要垄断权力，还要垄断真理，让他一个人的思考代替了全体国人的思考，还要把‘知识越多越反动’奉为圭臬，让知识分子斯文扫地，让偷听境外电台入罪；如果在‘开国领袖’领导下的27年里，鼓吹‘越穷越革命’，使人谈富色变，工人不涨工资，一家几代住在棚户区只有几平米、十几平米简陋房子里，农民劳动一天只能挣到几毛钱甚至几分钱，一年下来甚至要倒贴给生产队，以至于连《东方红》作者的儿媳妇都不得不出去逃荒要饭，请问，这样的‘开国领袖’是救星还是灾星？是该把他继续高高供奉在神坛上，还是把他从神坛上请下来？”

颜昌海先生说：“伟大领袖”总是给人民带来灾难。刘亚洲先生说：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

谢韬先生说：“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清理毛泽东，在走向一个更有活力的民主社会中，清理毛泽东的思想和障碍，不清理毛泽东几十年来造成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

这些基于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发出的义正辞严的质问代表了民心与正义。

而据中共中央研究室资料：有关党政军国家高级干部离休后或留下的遗嘱中，要求对毛一生再做完整、客观、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要求拆除、改建毛纪念馆，要求除去天安门上的毛肖像的占绝大多数，包括：杨尚昆、彭真、邓颖超、乌兰夫、谷牧、方毅、薄一波、洪学智、徐向前、秦基伟、杨德志、杨勇、聂荣臻、彭冲、陈丕显、江华、黄华、耿飫、赛福鼎、余秋里、肖劲光、谭震林、陆定一、张鼎丞、朱学范、杨易辰、张爱萍、雷洁琼、李井泉、韦国清等（不包括目前健在的元老）。

这个资料代表了党心。

无论民心、党心，都不应该也不能够长期无视。

毛离世已经30年了，对其做出历史评价的条件应该说已经成熟了。有人以对毛的评价分歧严重为理由反对对毛做出重新评价，这个理由是站不住的。其实，正因为分歧严重，才更应该正视这个问题，通过认真讨论，求得基本共识，让人民重新团结起来。📌

## 【序跋】

# 这段历史很重要

## ——《历史转折中的华国锋（1973-1981）》序

李锐

我是一向主张要把党史搞清楚的，真实记录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真正能从中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但是，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并不令人满意。一方面，档案不公开，或者是有选择地公开；另一方面，对突破体制规范的研究，又人为地设置“禁区”。其著述也无法在国内出版，而只能借助于境外出版机构得以面世，这就很不正常。

关于华国锋，过去我同他在工作中没有交集，也谈不上什么私人交往。1981年他就早早被迫下台，至于过程，知之不多。在胡耀邦下来以后，他同我的谈话中曾谈到华国锋的问题。耀邦告诉我，主要是邓小平，还有陈云，都认为华是“造反派”“坐直升机上来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又搞“两个凡是”“个人崇拜”。有关这次谈话，后来在我整理的《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中有记载，现在作者的这本书中也作了摘录，我就不再重复了。

有一件事对我是很有触动的，彭、黄、张、周在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上被毛整治，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领。1962年彭被允许回湖南调查研究，许多人是唯恐避之不及，华国锋却不同，不仅热情接待，请他吃饭，而且私下说了一句可能让自己大祸临头的话：“看来彭老总是对的”。这句话，1998年出版的《彭德怀年谱》里有记载。说明华国锋政治上是有他自己的判断的，说这样的话，那个年代是需要有勇气的，搞不好是会要付出政治代价甚至是生命代价的。

特别是后来他拍板除掉王、张、江、姚四个人，这个历史贡献怎么评价也不过分，但很长时间以来被轻描淡写地说成了“有功”。邓小平甚至讲这件事“没有他，也会有人推翻‘四人帮’的”。陈云也认为“这件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做”。平心而论，说这样的话有失公允。我知道，张爱萍对这些议论就很不以为然。他说：“说得这么轻松，应该做的事情，那他怎么不做？”我同张爱萍一直有往来，比较了解，他说的是一句公道话！记得徐帅当时好像也表示过这样的意见，意思是如果没有华拍板，是没法除掉那四个人的。当时是人家当道，人家首先要杀的就是邓呀、叶呀，其次才是我们。

邓、陈都是参与毛时代高层政治角逐过来的人，都是政治老手。特别是邓，他得了毛整人手法的真传。比较而言，华国锋要务实一些，在党内也远不如他们那样有盘根错节的背景。毛多次称他是“老实人”，比较厚道、公道。邓要取华而代之，不在于华是不是要搞“两个凡是”，是不是要继续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导思想，也不在于他是不是坚持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政治路线。事实上，从华的政治实践来看，也找不到这个答案。

这本书对此讲得比较清楚了。问题关键在于，邓、陈这些人根本瞧不上华，同叶帅不一样，叶是诚心诚意要大家来辅助华成为党的名副其实接班人。耀邦同我讲过他和赵（紫阳）也是不赞成动华的，但邓不干，陈也很积极。到了耀邦下



台了，邓还揪住不放，问他（耀邦）对华国锋是不是还是原来的看法。可见，邓这个人对华一直耿耿于怀。

萧克同我的谈话现在传得很广了，就是邓小平在1989年以后对江泽民说的那句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这就是邓小平的政治逻辑。以后，邓、陈之间有矛盾，邓又让薄一波向陈云递话“党内只能有一个婆婆”。薄一波退下来后约我谈话时就说过这个意思。可见，邓这个人擅权。这样的话，他与华国锋根本不能合作，至于出来时讲“当助手”一类的话，说明邓是该低头时就低头的人。林彪事件后，他要出来工作，像“永不翻案”这样的话，他对毛就讲过，他是能屈能伸。不过，毛对他既有“人才难得”的赞许，但同样也是心存疑虑。否则，毛为什么要他来做对一个对“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决议呢？

这个党是讲论资排辈的，毛之后，邓当然觉得在党内、在国内再也没有人可以压得住自己了。所以，他出来后就对华国锋讲“连个总理也不让我当”。这个话，后来耀邦同我说过。我是参加了1980年10月党内高层四千人会议的，邓不断打招呼，说“毛泽东的旗帜不能丢”，极力阻止对毛晚年的批评。邓这样做，是为毛辩护，也是在为自己辩护，更是为自己的历史辩护。道理很简单，因为毛干的坏事，邓大都参与了。改正“右派”就碰到这个问题，邓为“反右”运动作辩护，认为错误在于扩大化。问题是扩大化了多少呢？55万人当中，54万多人被“改正”，这是扩大化能说得通的吗？

在讨论决议过程中，邓反复讲“毛的旗帜不能丢”，他还有过一句话：“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他认为“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其实，当初很多人是不赞成的，为什么毛的错误要有全党来承担？要由别的人来承担？最后，决议也没有完全吸取大家的意见。本来结束文革，应该有一个好一点的决议，不必如此匆忙。叶帅在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是这个意思。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应当在适当的时候，做出正式的总结。但邓等不及，因为这个决议里头要把华国锋写进去，也就是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华实际上实行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左”的思想政治路线，决议罗列了华国锋犯有多项错误，包括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拖延和阻挠老干部复出，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这样一来，也就为邓、陈他们“倒

华”找到了合法性。

不过，将近三十年后，华国锋逝世，在新华社播发的华的生平中，原有的主要错误一概未提，而是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理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很大成绩。”“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对于粉碎“四人帮”，也不再是仅仅说华国锋有功，而给予了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评价：“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后，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做出的重要贡献。”

这个转变是怎么来的，我不太清楚，但有一些新的评价总比沿用原来的说法要好，至少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是可以恢复它的本来面貌的。

现在，施滨海同志在这本书里，以大量的史实表明，在华国锋实际主政的两年多时间里，开放和改革，包括经济特区的设立，已经提上了日程并逐步启动。虽其始也简，但不是“徘徊中前进”。胡耀邦用过“扭转乾坤”来形容这两年，我认为是符合事实的。

众所周知，明年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十周年，大家不要忘了三中全会和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是华国锋主持的。不难想象，没有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及时、主动地承担责任，提倡畅所欲言，解放思想，并适时地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三中全会很难实现人事上调整并形成历史的转折，至少不会那么顺利。可以说，那时也是党内民主得到最为充分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而这与华国锋本

人的民主作风有很大关系。我们总不能连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承认吧。

我已经是百岁老人了，在党八十余年，又有一些特殊的经历，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是有这个资格的。像华国锋这样对国家有大功的人，我还是要说几句公道话。📷

【序跋】

## 国际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样的运动

### ——《绕不过去的点》序

朱 正

无文小友将新著《绕不过去的点》的电子文本发来，要我作序。趁便说一点我对一些相关事情的看法，向无文小友和各位读者请教。

罗章龙二十出头即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后来做到中共中央委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知名人物。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个什么样的运动。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攫取政权以后，它的领袖列宁、托洛茨基们为了摆脱俄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孤立处境，派人到各国去寻求同情者、合作者，建立共产党。这样就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说是帮助各国开展革命运动，而首要的、最高的目的是维护苏俄的安全和利益。

派来中国的是维经斯基。他找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牵连出毛泽东、罗章龙这些人。这些人所以能够接受他的说辞，愿意同他合作，是因为这些人早就想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外患不断的现状，可是又痛感到自己的无力；现在有一个国际组织愿意帮助自己，当然就乐于跟着走了。他们帮俄国做事，却自以为对中国有益。大家知道：张作霖绞死李大钊，并不是因为他信仰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是俄国利益的代理人，是外国间谍。

1929年中苏两国因为中东路管理权限出现分歧，苏联派出重兵入侵中国。那时瞿秋白正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0月7日斯大林提出组建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军队，派到满洲去作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八卷，第187页）。瞿秋白就按照斯大林的意见，

指派黄平当党代表，刘伯承当司令，到海参崴召集了许多华工，多数是开金矿的华工，向他们做了一些宣传鼓动工作，组建了一支有三四百人的队伍（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71页）。1930年1月，瞿秋白写了一篇《中国的苏维埃革命》，热烈赞颂苏联的这一次军事行动。他把这事和国内的一些工人罢工、江西红军的反“围剿”战争联系起来，说：“中国工人群众的这些示威和农民游击战争的发展，和苏联的远东军防御满洲军阀而打的胜仗，是同时的。这并不是偶然的事。中国的工农把苏联远东军的胜利，认为是自己的胜利。普通的中国工人都高呼‘俄国的苏维埃万岁，中国的苏维埃万岁’！‘毛泽东的红军万岁，加伦（布留赫尔）的红军万岁’呢。”（《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六卷，第824页）他不经意泄露一个秘密：按性质来说，毛泽东的红军和加伦（布留赫尔）的红军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苏联的利益作战的。

应该说，并不是只有瞿秋白一个人是这样看，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是这样看的，1960年9月19日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谈的时候，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人很了解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请苏联同志回想一下‘中东路事件’。苏军在中国东北消灭张学良的两个旅。我们就起来维护苏联，口号是‘武装保卫苏联’。所有敌人的机器都开动起来骂我们是苏联的走狗。”苏斯洛夫回答说：“我们对此表示感谢。”（见《阎明复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5，第625页）种种事实证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说的“国际主义”，就是俄罗斯民族利益的代名词。

在我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上最善于宣传、最善于粉饰掩饰、有最多的秘密，而且保密工作做得最好的运动。它不但要欺骗党外的群众，就是对自己人也要隐瞒。例如有一个时候，共产国际曾经有意和吴佩孚合作，1922年8月19日越飞给吴佩孚的信中说：“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第99页）这样的称颂也不可谓不高了。越飞甚至有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让孙中山和吴佩孚这两个互有很深敌意的人合作，孙中山任共和国总统，吴佩孚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同上书，第117页）

为了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拉拢吴佩孚的方针，陈独秀就要李大钊通过他的同窗好友白坚武去做吴佩孚的工作，在若干具体问题上还颇取得了一些成效。当吴佩孚看到1923年1月26日签署的孙中山与越飞的联合宣言，知道俄国已经决定同

他的宿敌孙中山合作，立刻放弃了联合俄国的想法，2月7日，血腥镇压了京汉铁路的罢工，成为共产党的敌人。可是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有一段文章说到拉拢吴佩孚这事：“当时中国共产党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现今共产主义叛徒陈独秀做代表，他当时对于吴佩孚确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谓‘孙吴联合’的主张。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确是同意此种主张的。”（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7页）

邓中夏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竟也不知道促使孙吴联合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而以为是陈独秀提出来的机会主义的主张，也可见这事是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不是参与其事的，就是中央委员也不让知道。由于对许多事情真相的刻意隐瞒，给人们研究这一段历史增加了许多困难。在这个意义上说，罗章龙把历史真相留给后世，就太有意义了。

罗章龙是因为反对共产国际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而被开除党籍的。这真是冤枉。毛泽东不也反对四中全会的吗？按照毛泽东的意思通过的历史决议更把四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党史又说，罗章龙还犯了“另立中央”的错误。其实“另立中央”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过。例如1927在武汉召开“五大”的前夕，当时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央机关还在上海领导三次工人起义，武汉的事情就是由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个人商量决定，可是没有人说这是“另立中央”。又如红军长征期间，在瑞金开过五中全会的中共中央随军行动去了。因为电台已经破坏，共产国际找不到他们，于是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活动。这两回都是共产国际认可的，甚至就是共产国际自己做的。罗章龙这回组织“非常委员会”却不同，而是反对共产国际的胡作非为。所以那时要开除，多年之后仍然不许回到党内来。

为此，罗章龙也许有些感到委屈和失望吧。可是今天来看，他那时被党开除，不准他回到党内来，却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幸事。中国共产党占领全国以后，发生了多少事情：出兵朝鲜、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派坦克去占领天安门广场。罗章龙死后发生的事情就不说了。如果罗没有被开除，或者恢复了党籍，就难免或深或浅地卷入其中。我在《新湖南报》工作时候的老社长李锐先生在为我们报社右派的回忆文集《1957年新湖南报人》写的序言中说：“我想，假如那时我还没有调离报社，对于上级布置下来的反右派任务，也



没有可能顶着不办吧。当然，我不会去制造这种‘全国第一’的大案，但也不能够不按照上级下达的指标，比如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4页），划几个右派分子交差吧。”尽管李序对反右派斗争完全持批判的态度，他还是说了这句大实话。罗章龙在党外，没有了作恶的任务和权利，所以他一直到最后，一双手是干干净净的，一颗心是平平静静的。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

说句题外话，中共占领中国，“占领”二字不是我的杜撰。毛泽东1949年10月15日致周世钊的信中说：“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45页）我看到过这封信的真迹。那时周世钊的女儿周孟瑜也在新闻干部训练班受训，她很高兴地把这封信拿来给同学们看。

鲍彤先生谈到鲁迅的名文《为了忘却的记念》，“也许鲁迅对非常委员会这桩公案其实不太了解”，当然是不太了解。在鲁迅生前，没有人发表这件事情的真相。我写的《鲁迅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288—289页）根据的就是罗章龙的《逐臣自述》，才说清楚了这件事。我作为一个受益者，衷心感谢罗章龙先生、无文小友做的工作。我更愿意以我的实例向重视史乘真实性的读者推荐这本好书。📖

2020年2月17日

## 【读书】

### 史无后例唯所求

#### ——读周孜仁先生《云南文革史稿》

李 辅

正当我国各省专家、学者、文革亲历者研究和撰写地方文革史蹒跚跋涉的时候，周孜仁先生撰写的《云南文革史稿》，横空出世，像一道鲜艳的彩虹，绽放在地方文革史园地，使这块风霜打压的贫瘠瘦土，出现了新的景观。

周先生站在世界现代文明的高度，以普世价值的眼光，冷峻地审视文化大革命

命。他了解的情况多，掌握的材料多，看的回忆多，采访的人物多，在困难的条件下，深挖细刨，比较考证，严格取舍，做足了功课，以丰富渊博的知识，老辣幽默的笔触，融汇贯通的史观，将云南文革中的人妖共舞、恐怖血腥，惊心动魄、一一道来。言之有据，真实可信。

总之，我认为《云南文革史》是成功的一部史学著作。

周先生在该书导言中说，“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也应该做的，就是将云南文革惊心动魄的岁月故事打捞起来、抢救下来，记录于纸，留给后世解读与评说”；“当未来某一天，历史的审判庭将要对这一段岁月的荒诞、血腥和罪恶进行公开的裁决，我们能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最可信的证词”。周先生写此书的初衷，完全可以达到、兑现。进一步讲，真正彻底否定文革，史无前例唯所求！

我对云南文革了解甚少。最早知道的是阎红彦的自杀。全国最早发生的第一个省委第一书记的自杀，震撼全国，文革的恐怖已让人初感。阎红彦案件作为问题一直存入我的脑海。《云南文革史稿》，开篇就讲阎红彦的故事。从阎参加革命讲起，把阎红彦的过往叙述的一清二楚。阎红彦到云南，有不同凡响的作为。

“云南本来传统、平和、温润的社会”，谢富治执政七年，搞极左，胡折腾，大跃进，放卫星，搞公社，办食堂，闹肿病，饿死人，把云南搞得贫困交加，民不聊生。阎红彦到了云南，一开局就关注民生，发展生产，休养生息，按抚边民。首先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特别令我敬佩的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压下，云南省委在全国发出唯一一份公开宣布“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红头文件”，公开提出“边疆不提两条道路斗争”，阎红彦总讲“千好万好，没有饭吃就不好。千正确，万正确，不发展生产就不正确”。1965年底，边疆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早在1964年，云南就实现了平均每人占有粮食780多斤，每户有大牲畜2头，小牲畜（主要是猪）3.3头，工业、手工业和文教卫生也有很大发展”。

“阎红彦主滇七年，确实对风行全国的某些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抗争，并取得让滇人赞誉的成就”。不难看出，阎红彦是个讲人性、有个性，有良心、得民心的高官。但是，文革开始，他也陷入最高领导人设下的陷阱，按反右的惯例，矛头向下，执行了资反路线。周先生写道，何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界对

此概念多有热议，但有一点很明确，即：所谓“资反路线”绝非刘少奇、邓小平新发明，文革前共产党一直都是这样干的，派工作组更是政治运动的成熟战法。

阎红彦跟着刘邓陷入泥淖，被造反派揪住不放。不得不逃到军区躲避。在这紧要关头，1967年1月8日凌晨1点多，秘书叫醒刚入睡的阎红彦，接听陈伯达的电话：“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接着江青又在电话里指责阎红彦害怕革命群众。要他立即到军区大院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

阎红彦已经无语，放下电话，边走边骂：“简直拿党和人民的事业开玩笑”，

阎红彦回到自己的房间，决定做最后的了断，将床头的安眠药片悉数倒进喉头，再将桌上的水一饮而尽，凌晨4时余，骇然发现：阎红彦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已停止呼吸！桌上放着一张写给夫人纸条：“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阎红彦说，他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需要补充的是，他是共产党内残酷的政治斗争害死的，是伟大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害死的，毛的工具——造反派也逃脱不了逼死阎红彦的罪责。

阶级斗争理论把中国引入互害型社会。云南的事实证明，不搞阶级斗争，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搞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天下大乱，要了阎红彦的命！

《云南文革史稿》用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不能只口头上空喊要彻底否定文革，而是要刨底挖根，彻底否定发动文革的思想理论！

写文革史，就是写文革的罪恶史。看清罪恶，恐惧文革，才可能断绝“几年后再来一次”。

周孜仁先生在史稿中，用了大量篇幅，不厌其烦，写了云南一次又一次、一次比一次升级、一次比一次凶残、一次比一次血腥的武斗。分析了文化革命变成武化革命的必然性。剖析了参与武斗各色人员的人性、人心、灵魂、欲望、梦想；参与武斗人员的阴谋、暗算、诡计、煽动、造谣、蛊惑种种伎俩。细述了武斗中双方杀戮、放火、爆炸、毁坏，肆意枉法的残酷与血腥的场面。这不是写武斗史，是写血泪控诉书。

武斗非义战，派斗无赢家。

周先生书中写道，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瘟疫，一场空前的大灾难。1966年到1976年，云南动乱的疯狂性、斗争的残酷性，群众间你死我活的仇讎厮杀，绝不下于全国其他省区。文革10年，两任省委书记凶死。一派因“路线正确”稳掌大权7年，另一派落败，被“新生红色政权”，以“划线站队”为由，以群众专政的形式对失败者实施镇压，造成冤假错案15000余件、打伤致残6.1万多人，迫害致死1.7万多人。八派手握大权，这一派曾经很自豪，说全国真正由造反派掌权的，除了上海，就只有云南了。1976年十月政变，“四人帮”垮台，云南政局重新洗牌，过去惨败的一派转而上台，完全掌握了对另一派绝对的罪责追溯权。这一次，他们名正言顺以国家暴力的名义对失败者进行大规模的“揭、批、查”。据《云南五十年大事记》记载，全省清查“重大事件”1816起，全省进入县以上机关的另一派群众代表，定为“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共7659人，分别被关押、审查、批斗。民间资料提供的数据则要大得多，据2017年3月10日原省妇联主任包亚芳等全省14个州市上访代表88人（均为入狱刑满的原群众组织领袖）写给中央第十一巡视组组长徐令义的申述报告4统计：“云南全省受到审查、批斗、办各种‘学习班’”共150多万人，判刑入狱的5万多人，判死刑2人。在整党“清理三种人”中，受到党纪、政纪、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无故清退回家等15万人。在审查期间，刑讯逼供打死、逼死、逼疯1000多人”，对于主要的知名群众领袖，都进行了形式公开的“正义的审判”。

造反派，不管哪派，均被浩劫。前途、命运被劫一空。有的甚至是生命。请问这样的恐怖的结局，你还想再参与这样一场“革命”吗？

文化大革命，一无是处。

如果说有点副产品，那就是灾难和挫折，唤醒了一些人。

文革导致改革。

周孜仁先生在《云南文革史稿》中，写了个闪光人物赵健民。这条汉子敢舌战康生。他提出按时召开党代会。就是主张党内权力再分配时，即使是搞形式的民主，也应按时公开搞搞形式。这个建议被康生诬为他要让刘少奇、邓小平篡党夺权。赵健民被康生打成“叛徒”，经历八年牢狱之灾。平反重新工作后，在可

能接任三机部长的时刻，主动让贤，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反对领导干部终身制。他坚决主张差额选举制。他是一个不谋私利、深明大义的改革派。他和“怕挖祖坟”“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的党内保守派，有着云壤之别。

怕挖祖坟的，不是把骨灰早早撒到海里，就是放到八宝山。不怕挖祖坟的胡耀邦，埋在了共青城。不怕挖祖坟的“国家囚徒”，安葬在昌平天寿园。“国家囚徒”去了天寿园，还有人害怕，让保安层层设防，拦截祭拜的民众。为什么官僚集团活着也怕，死后也怕；活人也怕，死人也怕。怕国人，也怕外国势力。说到底，非程序、靠暴力取得的政权，像窃贼获得赃物，总怕丢失，疑神疑鬼，不断搞斗争，搞运动，把疑似的政敌不断消灭，美其名曰“继续革命”，“阶级斗争”。工人本无资产，公社化后农民被剥夺的精光，公私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被赎买。全国的公民都是无产阶级，全国的资产都是公有制的党产。没有阶级了，哪来的阶级斗争？而且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党内资产阶级”是预言，后来真的出现。理论脱离实际，却要指导实际，必然制造内乱。

经过七十年，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为啥反而“稳定压倒一切”？如今，又有人重提阶级斗争，前几年，重庆“唱红打黑”文革的阴魂不散。彻底批判和否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只停留在空喊，还有长远和艰巨的任务。鉴往知今。研究文革和撰写文革史就显得更加重要，抢救性的工作，也十分紧迫。不为什么，就是防止文革死灰复燃，史无前例唯所求！❏

2019年11月于太原

## 【读书】

### 对叶昌明回忆的看法

越人

叶昌明的回忆文章披露了和上海文革相关的不少史料，尤其是他对上海“文革”尾段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问题所作回忆颇有史料价值。

关于粉碎“四人帮”后其上海“余党”的“叛乱”事件，长期以来官方的历史记述比较简单、模糊。近年来对于这段历史叙述分析较多的，有李逊先生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和李海文、王守家合著的《1976.10-1979.10“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以下简称李海文书）。李逊先生的著作对于上海



十年文革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与研究，该书第四十章“毛泽东逝世——最后的捍卫”用了约50页篇幅介绍了上海方面在面临四人帮被粉碎这一政治变局作出的各种复杂微妙反应，作者在书中较多使用了当时上海方面的重要领导人物如王秀珍、徐景贤等人的揭发交待资料，以及对不少参与上海文革的重要风云人物的访谈记录。李海文书则更多从中共中央如何解决上海问题的角度出发，详述了华国锋等在抓捕“四人帮”后派人到上海收集情报消息，并根据上报的情况先后召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令上海方面群龙无首，其规划的所谓反抗行动也基本上胎死腹中。

由于两本著作使用的不少材料来自于同一或类似来源，所以相关叙述内容较为一致。作为非官方的独立学者，李逊先生对于上海“余党”的反应和作为不是采取简单的负面叙述视角，更多是基于史料作出较为平实中性的历史叙述。李海文书则带有较多的官方叙述话语色彩，但书中论述评价柯庆施这位复杂历史人物时，说柯在被下属顶撞后却不怀成见，还提拔这位强项的部下，显示其政治胸怀和用人水平，也如实指出当时柯在老同志中威信较高（李海文书，第13页），这样的持平客观之论在该书中也并不罕见。

对于上海“余党策划叛乱”这一历史事件，上述两书的叙述给我们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但在不少具体细节上仍有所欠缺。正如叶昌明文中所言，李逊先生著作“对于发生在七六年十月间的这一极为重大的政治事件，记述太过简略，给人以草草收尾之感。”李海文书在细节叙述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而且该书受官史立场的影响，某些叙述难免有先入为主之见，甚至有的细节记录较可能存在明显的“失真”问题。

叶昌明的回忆文章涉及了十年上海文革的方方面面，关于“反革命武装叛乱”问题的论述则是该文后半部分的核心，占了整篇文章约一半多的篇幅。作者在文中全文收录了他在81年受审期间写的一份交代材料，详细记述了他们这些“上海余党”在10月8-15日参与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经过，叶在文章中还记述了10月15日之后“上海余党”受到批判和审查的一些情况，并在多年后写下了他对于“反革命武装叛乱”问题的反思和一些至今难解的疑惑。

叶昌明写的这份交待材料，李逊和李海文的书中都有所引用，但两书均只引述了该材料中的很小一部分内容，这次《记忆》杂志发表叶昌明的回忆文章，让

读者得以一窥全豹。该交待材料以一位“余党成员”的视角，较为详尽的叙述了从10月8日开始“上海余党”们的活动状况和心路历程。

在马天水被召去北京后，因与“四人帮”联系不上，“余党们”先猜测进而推断北京发生了事变，“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在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主持下试图有所行动，安排布置联络、指挥点，加强上海民兵战备等。在徐景贤、王秀珍也被召去北京后，总工会和市委写作组的一班成员虽然意图行动，但却受阻于四位看家的市委常委的消极态度。最终也仅能做到向工会和妇联干部层层“吹风”而已，当马天水等回到上海，传达中央指示后，所谓的“叛乱”筹划便自行瓦解。

读完叶昌明的回忆，笔者有几点感触。一是以往官方史书虽然对于“叛乱”事件语焉不详处甚多，但往往对所谓叛乱问题有所夸大，似乎上海余党叛乱早已筹划完毕，叛军也武装到位，马上要发动了。只是中央英明决策，才得以及时将这场叛乱扼杀掉。现在来看，这种夸大的说法或多或少与其对四人帮的定罪指控有关，正如叶回忆文章中所说，当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传达中央负责人讲话时曾提到他们向华国锋等汇报了上海的相关布置，华的表态是“笑着说早知道了，你们还打了许多电话，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没多久中央就将上海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叶昌明因此认为华的温和表态是“欲擒故纵”，后面的定性是为指控打击“四人帮”寻找更多的证据，这一认识可谓是一针见血。

二是如何看待这场未遂的上海造反派们的最后反抗，如果按照文革逻辑，遵循毛留下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向中央进攻”的最高指示，上海的这些反应和举措自然存在某种合理性。而如果站在彻底否定文革的逻辑上，给“上海余党”们带上罪行帽子也没有问题。但华国锋他们既要粉粹“四人帮”，又要继承毛主席的革命遗志，对上海方面的定性难免就带有某种自相矛盾的荒谬性，后来“两案审判”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叶在受审时感觉最难接受的是有关他们“反革命”的定性，即指控他们要推翻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同样，林彪集团的成员们也对于这种指控感觉啼笑皆非，邱会作在回忆录中对于80年审判时指控他这位老红军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一事始终耿耿于怀。正如陈云所说，“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场党内斗争”。华国锋声称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两案审判将党内斗争刑事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可能有政治上的需要。但站在历史研究的角度，沿袭这种并不合理的政治定性是相当不妥的。在这点上，

李逊先生的著作做得很好,《上海文革运动史稿》对文革结束的这最后一幕作了冷静的论述,行文较为客观平实,并依据史料指出“上海余党”们的努力必将失败:“即使上海真的举行起义,这样的反抗也注定不会成功……写作组和总工会却以为他们一旦起义,虽然注定失败,但至少会轰轰烈烈一阵,根本不了解文革早已天怨人怒,这是他们的悲哀。”多年后叶昌明回顾这段历史,也写下了这样的反思语句:“我们的自我感觉太好……狂妄地自以为可以‘对着干’,甚至认为只要我们‘登高一呼’,就会有四方的积极响应。现在回想往事,真感到可笑又可悲。”

三是叶昌明文章对李海文书中某些叙述细节的质疑,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涉及该书对12日晚康平路会议上关于某项叛乱计划提议的叙述。李书中称当时有人在会上提出要在“13日下午5时上下班时间,街上人多之机打响第一枪”,还要逮捕100名上海反对四人帮的老干部和北京来上海的“八人小组”各位成员,发动叛乱后就杀掉这108人(李海文书,第74页)。值得注意的是,这条如此惊人的细节出处却是源于作者对“八人小组”两位成员曹大澄和王守家的采访记录,在作者较多使用的上海余党交待史料中却没有可以相互印证的内容。提出这项建议的人姓甚名谁,书中也没有任何交待。据叶昌明文章所述,直到他们被关押时都不知道中央先遣八人小组的存在,而李海文书中虽然绘声绘色的描述了八人小组所住的衡山饭店中几名“服务员”对八人小组的监视活动,但在书中引述“上海余党”交待材料叙述“余党”们的密谋策划活动时却没有任何涉及监控八人小组的相关具体内容,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该书记述的所谓上海余党发动叛乱后要杀掉八人小组成员一事的可靠性。基于孤证不立的史学原则,对于李海文书提供的这一重要历史细节研究者还是先存疑为好。

四是叶昌明文中关于老干部和军队领导人参与“叛乱”活动的疑惑,叶在文中认为他们这些造反派干部缺乏“缺乏政治斗争的历练,更没有军事知识,加上在文革中一帆风顺,显得狂妄自大,不知轻重地提出要‘对着干’”。但他却想不通那些老干部,“尤其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为什么也会跟着一起‘胡闹’,没有提出过一丝的异议,劝阻大家冷静考虑问题的严重性。”李逊先生在其著作中认为王少庸等老干部早就知道以上海民兵武装对抗北京必然失败,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敷衍造反派干部罢了(李逊书,第1597页)。笔者赞同李逊先生的

意见，但觉得还可以补充一点看法。那就是经过‘文革’开始后多年的政治动荡，许多老干部在政治取向上往往比较微妙复杂，两面下注的大有人在。比如中央后来派赴上海主持工作的中央工作组组长苏振华，其在‘文革’后期的政治表现就相当复杂。据肖劲光回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苏振华积极配合，签发以海军党委名义给江青的致敬信，当江青看到海军水兵帽子上的飘带，说了一句“这是纪念纳尔逊的，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苏即下令剪掉海军士兵帽子上的飘带（《肖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340页）。而到了毛泽东批评‘四人帮’之后，苏又给毛写信揭发江青的私下活动（李海文书，第88页）。到了七五年底政治方向转换，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苏又“领导海军积极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批邓’的调子越来越高……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影响极坏”（《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351页）。在经历“文革”这种残酷的“绞肉机”式的政治斗争后，很多高级干部复出后为求自保，也只能随着政治风向的转移不断见风转舵了。📌

## 【读者来信】

### 1. 赵晖谈“揪军内一小撮”

第274期节选了王复兴先生《孙蓬一和北大文革》一文，其中提到“揪军内一小撮”的“八一社论”，王先生指王力、关锋、林杰起草了该社论，在他们煽动下，爆发了“毁我长城”的反军高潮，王先生还认为这股风潮是王、关、林极左路线的重要方面。对此笔者有些不同看法。

王、关、林确实在文革中干了不少坏事，但要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他们主导搞的极左路线的一部分是不符合史实的，据王年一先生回忆，他亲眼看过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康生在‘七二〇’事件中在北京请示过在外地的毛，可不可以用‘揪军内一小撮’一语，毛说可以，康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周、叶群、江青等人。（因特殊机缘，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让我看了这个档案。当时《红旗》、《人民日报》用此语，有所据。）”（王年一致阎长贵信，2005年10月15日。《记忆》第1期，2008年9月13日）。

毛之所以同意“揪军内一小撮”，源于他对当时形势所作的估计，他在“七二〇”事件后，一度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和驻军都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武装左派’。”1967年8

月4日毛给江青写信，信中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的专政”，“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31-232页）。

但毛泽东很快又改变了主意，8月中旬他在上海会见外宾时表示，“要依靠解放军。我们的军队，野战军好，陆、空、海军好。有些地方军好，有些不好。要使坏的好起来，需要时间”。“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不要把军队搞乱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111页）。

经过短暂的游移之后，毛又回到了此前依靠解放军稳定全国局势的轨道上来。而王、关、戚则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被“剥笋”了。正如何蜀所言，“无论是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还是批判“揪军内一小撮”，都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在1967年7月底之前就已经持续闹腾了半年多的“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不是不知道、未“发现”，而是了解得清清楚楚，并且给予了明确的鼓励和支持”（何蜀：《“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1期）。所以并不存在王、关、戚的极左路线，他们只是毛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背锅者罢了。❏

## 2. 何蜀谈方延曦回忆录

方延曦文相当好，一个当年的积极参与者，能如此清醒地反思，而且把有关事情叙述得如此仔细、清晰、客观、生动，十分难得。美中不足的是把“井冈山”都错写成“井岗山”。当年确有不少传单小报上是那样写错的，但现在作为历史回忆，则以准确表达为好。❏

## 3. 张晓良纠错

275期方延曦专辑二，第15页第8行的“倒歉”应为“道歉”。❏

## 4. 王芳正误

关于地方文献的那篇文章，发现关于湖北的著述有两个地方似乎有误。1. 陈再道的《浩劫中的一幕》，我认为不属于学术著作，或许称回忆性文字或回忆录更恰当？2. 《记忆中的底层文革——关于“文革”时期武汉钢工总的口述历史



研究》，是我的硕士论文，而非苗立峰。我想您这个出处应该来自于金大陆老师的一篇文章，即《关于中国“文革”研究的现状和前景》。金老师的文章当时发表时，我大致浏览了一下，竟然也没发现这个问题。❏

###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

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